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

司徒尚纪 王元林 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湛江港与 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陈立新 张波扬 陈 昶◎著



SPW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新华书店

作者简介

陈立新，字庆堂，1950年生，广东湛江市人，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水运工程与管理专业。长期从事港航专业研究和管理工作，历任交通部湛江港务局策划发展处处长、湛江港中海集装箱公司董事、福利保障中心主任、物业公司经理兼建筑安装公司经理、湛江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专家委员会负责人、临港工业园开发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并被聘为湛江市人民政府规划专家组成员。几十年来，参加过多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发表和提交的研究报告40多篇。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文章及出版专著300多万字。

张波扬，1988年生，华南师范大学2017届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参与《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史料汇编(第1辑,套装共3册)》项目的馆藏文史资料整理工作；论文《新中国前期湛江港崛起及其动因探究》，收录于广东省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于2016年8月主办的第二届“当代史：文献与方法”研习营论文集；论文《国民政府对湛江港新规划之探究》，收录于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于2016年12月主办的首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陈昶，1977年生，2000年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任职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税分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喜好水运、物流经济类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

司徒尚纪 王元林 主编

湛江港与 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编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陈立新 张波扬 陈昶 编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 陈立新, 张波扬, 陈昶编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454-6588-4

I. ①湛… II. ①广… ②广… ③陈… ④张… ⑤节…
III. ①港口—交通运输史—湛江 IV. ①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89215号

出版人: 李 鹏

责任编辑: 周 晶

责任技编: 许伟斌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Zhanjiang Gang Yu Haishang Sichouzhilu

出版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12楼)
发行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环村路238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250 000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454-6588-4
定价	6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11楼

电话: (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

编撰组织成员名单

组委会

主任：徐少华

副主任：张爱军 张小兰 周 羲

编委会

主任：张小兰 周 羲

副主任：陈小敏 麦淑萍 黄 尤 彭 贇 庄福伍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培楠 古伟中 白 玲 刘胜利 苏泽群 胡浩民

洪三泰 索健元 黄淼章 蔡玉明 蔡高声

学术委员会

主任：黄伟宗

副主任：司徒尚纪 王元林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春生 田 丰 朱 竑 刘正刚 李庆新 杨兴锋

吴松营 冷 东 张 磊 陈永正 陈海烈 郑楚宣

侯月祥 顾润清 徐远通 衷海燕 黄启臣 章文钦

韩 强 曾 骐 谭元亨

书系编辑部

总主编：黄伟宗

主 编：司徒尚纪 王元林

港口篇编辑部

主 编：司徒尚纪 王元林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 强 汤苑芳 许桂灵 李 燕 李坚诚 李爱军

陈立新 孟昭锋 黄迎涛 熊雪如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
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
组 编

总序



港口作为水陆运输转口基地，具有客货流吞吐功能；港口拥有陆向和海向腹地，深入广大城乡和海内外地区；港口附近还是临港产业区，可配置各种海洋产业，形成巨大的产业集聚区。故港口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或生长极，能产生巨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举凡世界上临海的国家，无不对港口开发建设重视有加，并将其列入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举措。特别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进入海洋时代，港口在航海和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而出现不少新港口，直接影响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就说过，“财富取之于海”。港口作为扬帆航海的起点，也是财富聚集之地。在古代，广州是我国通往世界各地最大的一个港口，历有“天子南库”之称，广州港税收，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我国自西汉以降，即以合浦、徐闻港为起点，开辟了延续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进行和平、友好、平等的商业贸易往来，也借此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广州、泉州、宁波、海口、三亚等港口对此贡献匪浅。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多，不少地区自古以来就被开辟为港口，从粤东樟林、柘林、潮州、汕头、南澳、汕尾、屯门、澳门、广州，到粤西阳江、电白、赤坎、雷州，到海南琼州、清澜、三亚，以及广西北海、钦州、防城等，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基于广东交通的特殊地位，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里所说的“广东交通”，港口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就拟定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开发战略，勾画了发展蓝图和布局方案。仅就海港建设而言，孙中山先生提出建设北方、东方、南方3个一等大港，营口、福州、海州、钦州4个二等港和辽宁至海南的15个三等港。其中在广东沿海的就有汕头、电白、海口港，以及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4个渔业港，它们共同形成我国东部、南部海岸线分布的海港体系。同时，孙中山先生将这个海港建设与和它们相连的河流或腹地的整治、开发利用一体规划、设计，形成江海一体、海港和河港一体、海陆并举的建设观。例如建设南方大港（即广州港），其计划就包括了广州港本身的改良、西江河道整治、北江河道整治、东江河道整治、航线疏浚、运河开凿、新地填筑、水闸兴建、物资运输等，涉及多个部门和沿海城市与地区，实广及广州港陆向和海向腹地等问题，无疑是一份珠江流域和南海近岸海域开发规划方案。孙中山先生还将海港建设与海军基地建设相结合，认为开发海洋资源、加强外贸、发展海上航运与海军基地建设都是不可分割的。虽然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逝世，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它仍指引了以后我国港口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港口规划、布局、建设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世界海洋是一个整体，不像陆地相互分割。孙中山先生深刻总结了长期海禁、忽视海权导致国土主权丧失、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教训，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要掌握海权，必须要有控

制海洋的手段：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国家的“富强之基”。而建设海军，必须发展造船业，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使中国成为一等强国。为此，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提出“创立造船厂”，“当有一航行海外之商船队，亦要多数沿岸及内地之浅水运船，并须有无数之渔船”。孙中山先生这一海权观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得到落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海军活跃于世界海洋，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军力量之一。

毋庸置疑，海陆国土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权益维护，特别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都必须以海港为依托、为基地、为保障，所以，港口建设已成为我国沿海省区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广东作为我国最大、最强的一个海洋省，港口建设已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各项规划、建设方案源源而出，正形成向海洋进军、大力开发海洋的热潮。

在这种背景下，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指导，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港口篇）》可谓正合其时，不仅可为广东海洋大省、海洋强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支持，而且可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

首先，该丛书总结了广东主要海港发生、发展、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并提供了它们演变的一系列历史剖面。如千年不衰的广州港，其在历史上数易港址，从南海神庙附近扶胥港到今海珠区黄埔古港，到20世纪30年代黄埔港，再到现今大沙地黄埔新港等。虽历经多次变迁，但广州港仍没有衰败，一直发挥其功能，对广州城市商业贸易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又如潮州港，其古代在今潮州市原韩江出海口，后韩江淤积严重，港口南迁40多公里，港址也南迁，遂有汕头港兴起，对促进韩江三角洲经济开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故认识潮州港、汕头港的历史变迁和两者的关系，对潮汕地区发展战略、产业选择、布局、城市群建设等，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新兴的珠海、深圳等港的历史，该丛书也备述其详，为当今港口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资料。

其次，该丛书对各个港口的海陆腹地勾画了大致轮廓，这对认识港口地位、货流来源、结构和流向，甚有实际应用价值。如新兴的深圳港、珠海港，其现已成为珠江口两大巨港，吞吐量非常大，不仅事关两大特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与香港港、广州港、南沙港，以及当前正在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关系甚大，该丛书对深圳港、珠海港的阐述，无疑可为环珠江口其他港口发展和协作提供借鉴。又如阳江港，虽原有一些渔港和小型商港，或渔商两港，但因港小、吨位不足，难以支持当地海洋经济振兴。近年来建设的吉树港，可泊万吨巨轮，又配备专用铁路，使其腹地远及华南和东南亚，这为阳江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是阳江以海兴市、以海旺市的强力支柱。类似这种港口腹地的交代和划分，及其区域关系的剖析，成为丛书的一大重要内容，增加了它们的应用价值。

再次，丛书以港口为核心，充分介绍了相关的海陆资源，从点扩展到面，涉及一个相当大的海陆区域，为海岸带、近岸海洋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广东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单位面积海洋生产量比同样面积陆地生产量要高得多，效益也大得多，故临海地区比内陆富裕。语曰：“水深处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水聚处民多稠，水散处民多离。”丛书编著者深切了解港口与资源的关系，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港口附近海产资源、海岛资源、滩涂资源、城镇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人口资源（如疍民），涉及它们的数量、质量、分布、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等，并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评价，可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如《阳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即对阳江市境内各大海河港的旅游资源赋存、开发利用做了较为客观、充分的介绍，特别是对海陵岛各景区的介绍，颇为翔实，读后如置身其中。这对认识这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吸引游人，甚有裨益。其他诸作，也无不如此，故本丛书虽曰港口丛书，实无异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丛书。

此外，该丛书发端于海上丝绸之路，归结于“一带一路”，达到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之目的，具有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可供相关研究比照参考。广东沿海港口多有悠久历史，且其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海上丝绸

之路的兴衰。这其中涵盖了港口本身的历史、交通线、腹地、城镇群落、区域经济发展等，都直接或间接与港口所及港址、腹地、周边地区开发、海上贸易、海防安全、外交关系等相关，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该丛书各卷，每介绍港口历史，多追溯其兴起的地理和历史基础，尤其后者，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相联系，从中可窥见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社会经济文化作用甚大，丝毫不让于其他省区。如湛江港卷，即从汉代徐闻、合浦港说起，经历代变迁，到清末广州湾崛起、现当代湛江港建设，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又如阳江港，其在南朝时已为海上丝绸之路转口港，宋代海陵岛（时称溲洲）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补给站。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在附近海域沉没与此不无关系，该著作对此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其他各卷，也大抵如此。可知，丛书写作，从其伊始，即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宗旨，故能有效地指导丛书之编著和出版，也可视为对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争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个响应。

2013年以来，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广东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制定了相应的决策和要求，规定了各项具体任务，形成了响应中央这个重大决定的热烈气象和付诸实施的态势。各地也相应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对策与措施。在这种背景下，丛书各卷均设置了一定栏目，专述各港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建议，供有关港口政府决策参考。这包括各港口的历史梳理，港口运作的经验启示，宜采取的政策、技术、措施等，不仅有助于港口建设，而且对它们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丛书是实践了这一古训的。

再者，该丛书的很多内容是作者野外调查所得，明显地补充了历史文献、现代各类资料的不足，使之更具可靠性和真实性。如湛江港、潮州港、汕尾港、茂名港等卷，作者就深入港区现场考察，走访当事人，实地观察港口历史、现状，拍摄大量照片、绘制相应的地图等。这也说明，即使当今科学昌明、GIS技术发达，但也不能取代野外考察，后者仍是涉及区域的科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最后，本人作为该丛书的一位主编，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敬请有关部门、地区和读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18年1月17日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序



古代海上丝路的丰碑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陈立新同志编撰的《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优秀著作。可以断言，本书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全面地阐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专著，是见证湛江古代海上通道和湛江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的丰碑。形成于西汉的徐闻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是世界上已知的有史书记载的，官方经营并以丝绸为主要交易产品的国际贸易港之一。因此，本书对于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湛江海运历史和海洋文明史的空白，可喜可贺。是故，我不揣浅陋，竭诚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与著述。

我和立新相识相知已逾40年。时光流逝，立新后来被调到湛江港务局工作。我知道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勤奋地从事文史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停步。他不时有史论及深具史识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发表。他对湛江港的历史乃至我国港口的历史、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研究，对湛江人之根的研究，尤其是对有极其庞大根系的陈姓家族的研究等，都下过苦功夫，并卓有成就。长期以来，立新在工作之余自费跑遍全国各大图书馆、博物

馆，收集有关湛江的史地尤其是历代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资料。作为从湛江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历史学者，立新不但有丰富的史地资料积累，而且十分重视实地考察。他常跟随省、市的考古专家到雷州半岛各地进行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的考古挖掘，寻觅和研究有关出土文物，收集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本应由湛江市的学者阮应祺和陈立新编写，但阮应祺先生不幸因病突然去世，这项繁重的工作只好由立新承担。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艰苦写作，终于完成这部专著。全书分为十六章，近30万字，涉及湛江海洋文化、海上通商和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科学诸多方面。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历史真实的生动再现，可读性强。作者遵循恩格斯所提倡的“严格的历史性”，通过丝路这根越洋蓝线牵出了各朝代发生在辽阔海域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多少悲喜剧上演于蔚蓝的大海之中！而中国的辽远海域最早以南海的巨大浪涛撞开世界各大海洋之门。19世纪德国伟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发出的“中国……已进展到了此种耕地的地位。但是占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的论断，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汉武帝乘风破浪西去的船队击破。在立新笔下，西汉的造船业、星象导航术、汉武帝楼船大军平复海南、古徐闻港兴起等，都充溢着丰富的信息，而且十分具体生动。

第二，本书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历史科学，探究和揭示历史的规律。西汉开海，东汉新道，两晋楼船，隋唐市舶，宋代海运，元代扩张等，都是以开放海洋为宗旨的，因而赢得了顺畅的海上通道，海外贸易繁华，促使社会发展，民生兴旺；明代海禁，清代也海禁，使海上丝绸之路由盛极走向衰落，国力减弱，民不聊生。本书通过阐述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和堵塞的真实历史，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海开则国兴，海塞则国衰。

第三，对宏观的把握全面、准确、严谨，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特色。历史的大背景和湛江的历史交错道来；历史的源与流，线条清晰可鉴；全国史料与地域史料及出土文物达到高度吻合；历史呈现的时间与空间、承接与发展，总是有机地联系着；历史的根系，朝代的枝叶，层次分明。如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中，作者引用诸多典籍，充分地证明了秦汉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相当发达。这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本书传递了丰富的史识、信息量和古代海洋科学知识。这本《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一部关于海洋文化、海上活动和海内外关系的历史教科书。立新运用了自己所积累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史的知识，并吸收前人的经验，扩展了湛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科学内涵。立新长期在湛江这个大港口工作，参与了港口规划、港口建设、全国港口的工作学术交流和港史、港志写作等方面的活动，研究项目很多，知识积累丰富。加上他勤于广泛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有关典籍，使他的知识积累十分厚实。写作这本书时，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如对“南人善水”的描述、对广东近岸海流分布的剖析、对广东沿海海潮流速的比较等，都有科学的依据，尤其是对南海季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的分析，更是生动传神。因受季风影响，南海海面风海流的方向有变；湛江港近海全年有反时针环流的同时，沿近岸有西南向海流。因而结论为：雷州半岛东海岸沿岸冬半年适于船舶南下，夏半年南下船舶会遭遇逆流。西汉船队沿途加水和补充给养，完全据海潮流速而定。在当时航海技术条件下，西汉船队不可能从广州番禺直接开到北部湾沿海。在汉徐闻港等候季风启航，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汉徐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作者传递了很大的信息量和多方面的海运、海外贸易的知识，如造船、季风、丝绸、陶瓷、海流、气象、考古、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宗教、贸易、人物、方物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在全书中都得到生动的介绍。

第五，进入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发端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阶段，湛江谱写出了一部反侵略斗争的壮丽诗篇。本书记载了这段历史的人和事，彰显了伟大的民族抗争精神。关于近代以后湛江的海上交通、海港变迁、海港建设等方面，本书也有较详细、生动的记述。它告诉读者，历史和现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在湛江乃至南海海面上的海运故事、海面战事、海湾风云，使人们认识到海洋文明和海洋野蛮会同时存在，

海洋的悲喜剧会交错上演。而海洋文明之光，总会战胜黑暗，给人类带来希望。这是本书存在的现实意义。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陈立新的《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重史实，重考古成果，重切实分析，是一本充满求实精神和心灵智慧的书。它把遥远变成亲近，把朦胧变为清晰，把繁杂梳成简洁。这样，读者会受它的引导，透过湛江海洋史的无数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到本质；翻动历史的叠垒海浪寻得真正的历史规律；在众说纷纭中明辨是非，消解歧见，以求兼容共存；在南海海上时空的生动记述和描写中，站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远眺，会更加聪慧，更加清醒，会为海洋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自豪。

明智由读史而来，胆略自观史而生。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立新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如“西汉徐闻县城遗址到底在哪里”一段，作者详细地引用元、明、清县志的记述，寻找出共同的结论，并根据共同的结论，实地“丈量”。作者还运用近年来的多次考古的成果，进一步展现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古村落和古遗址的逼真风貌，突显出作者的求实精神。类似章节段落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赘述。

读这本著作，你会觉得在2000多年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中西海外贸易、文化交往、宗教传播、方物转移、海洋规律、航海知识等，形成了知识明珠，把中西文化联结起来，文化之光，璀璨无比。读之，茅塞顿开，眼前一亮。综观湛江2000多年的历史，开海与海禁的经验教训，依海与望海的情结理想，无不冲击着今人的心灵。人们会在历史科学的殿堂里寻找到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这座灯塔，在仰望中，会悟到它所兼具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社会功能。由此而拓展胸怀，真正做到海纳百川。祝愿中华民族能如巍巍巨舰，在浩瀚奇丽的海洋里，乘风破浪，驶向光辉灿烂的彼岸。

洪三泰

2018年8月

（洪三泰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前言



湛江港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省雷州半岛，东临南海，南望海南岛，西靠北部湾，北倚大西南，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非洲、欧洲和大洋洲航程最短的港口。

古徐闻县含雷州半岛全境，包括今湛江市大部分区域。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相吕嘉在番禺（今广州）发动叛乱。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军前往平乱。翌年冬，南越平，以南越地划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不久，汉武帝派出隶属黄门的译使，与应募者组成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织物）等物，从徐闻、合浦出发，沿北部湾和越南海岸南行，环暹罗湾沿岸及沿马来半岛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约5个月到达都元国。此后，船队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航行约4个月到达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又向西北行20多天就到了谶离国（在缅甸西海岸），并从这里登岸步行10多天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太公城），再沿岸航行2个月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半岛东南岸马德拉斯附近）。最后，船队向南抵至“汉之使自此还矣”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航线。2000多年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促进

中西方各国的友谊及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徐闻，也因此为世人所瞩目。

湛江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化海港。1955年7月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设湛江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指出，为了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国内物资交流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在广东省湛江市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决定》将湛江建港工程列为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1956年5月1日，湛江港建成2个万吨级泊位及相应设施，宣布提前投产使用。

2016年是湛江港开港60周年。湛江港在改革中发展，在挑战中奋进，从1956年至1979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用了23年；至1993年货物吞吐量突破2000万吨，用了14年；至2002年货物吞吐量突破3000万吨，用了9年。此后港口发展一路高歌，从2003年至2008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用了6年，成为西南沿海港口群首个亿吨大港；2014年，湛江港实现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同比增长12.4%，是年增幅为全国主要沿海港口的第一位。中国第一座最大的5万吨级原油码头，中国第一个最大的30万吨级原油泊位，中国第一个最大的40万吨级散货泊位，先后在湛江港建成投产。2016年，湛江全市港口货物完成吞吐量2.56亿吨，同比增长16.2%，货物吞吐量居全国沿海港口第11位，增幅连年居全国主要沿海港口前列，超越广西北部湾港、深圳港，成为西南沿海第一、广东省第二大港口。

湛江港的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正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向着更高的目标阔步前进。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发展，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湛江港顺应时代潮流，紧随国家发展趋势，发展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重要支点港口、西南沿海港口群的主体港，是中西部地区和华南地区货物进出口的主通道和中国南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散货的主要集散中心。站在新的历史关口，湛江港挺在祖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的前列，砥砺前行，力争为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 第一节 汉武帝平南越 / 002
- 第二节 徐闻港的兴起 / 004
- 第三节 徐闻汉遗址的发现及出土文物 / 010
- 第四节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路的背景 / 026
- 第五节 西汉南海丝绸之路航程与交易对象 / 031
- 第六节 西汉海上丝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038

第二章

东汉三国时期

- 第一节 风帆的出现与南海新航路的开通 / 042
- 第二节 大秦道的开通 / 044
- 第三节 交州刺史部的改置 / 051
- 第四节 交州刺史部的迁徙与广州的再度兴盛 / 053
- 第五节 珠崖郡治移置徐闻 / 057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

- 第一节 雷州半岛——经略东南亚和海外的前进基地 / 060
- 第二节 波斯通使与南朝藏宝 / 064
- 第三节 佛教传入雷州地区 / 066

第四章

隋、唐时期

- 第一节 市舶司始置与海上丝路的发展 / 070
- 第二节 唐代湛江的丝纺业 / 081
- 第三节 湛江唐代瓷窑的兴起 / 083
- 第四节 海上通信 / 086
- 第五节 唐代佛教交流与雷州 / 086
- 第六节 雷州政治经济中心北移的原因 / 090

第五章

宋代湛江海上交通与涉外经济的发展

- 第一节 湛江陶瓷的全盛时期 / 092
- 第二节 宋代高、雷沿海经济发展 / 101
- 第三节 宋末战乱对北部湾周边地区外贸的影响 / 104
- 第四节 宋代航海者的守护神 / 109

第六章

元代的海运与海外扩张

- 第一节 元代雷州陶瓷的发展 / 116
- 第二节 元代的海运与水陆交通 / 118
- 第三节 海北海南道博易提举司的设立 / 119
- 第四节 元代雷州与福建港口的联系 / 121
- 第五节 元代雷州海外贸易文物 / 122

第七章

明代湛江的海外交通

- 第一节 海上丝路盛极而衰 / 126
- 第二节 明代海禁与南海海防 / 130
- 第三节 明代番舶与两家滩港 / 138
- 第四节 明代海防重镇通明港 / 141
- 第五节 明代芷寮港 / 143
- 第六节 明代梅菪港 / 144
- 第七节 汤显祖与海上丝绸之路 / 145
- 第八节 基督教传入雷州半岛 / 150
- 第九节 外来方物 / 151

第八章

清代湛江与海外的交往

- 第一节 清初海禁对高雷二府海外贸易的致命打击 / 156

- 第二节 清康熙后“一口通商”与高、雷地区海关 / 162
- 第三节 清代赤坎港 / 168
- 第四节 清代基督教在雷州半岛的发展 / 169
- 第五节 雷州人民海上反清斗争 / 170
- 第六节 关湫尾灯塔的建造与变迁 / 180

第九章

法国强租广州湾

- 第一节 吴川、遂溪人民抗法斗争 / 184
- 第二节 天主教、基督教在湛江的活动 / 206
- 第三节 广州湾早期的导航设施 / 210
- 第四节 广州湾早期的港口设施 / 211
- 第五节 法国人经营广州湾 / 213
- 第六节 日寇侵占广州湾 / 222

第十章

广州湾回归与大建港计划

- 第一节 日本无条件投降与法中交收广州湾 / 226
- 第二节 开放湛江市为我国西南商埠案始末 / 231
- 第三节 广州湾港1946—1949年进出口贸易情况 / 241
- 第四节 国民政府筹划湛江建港计划与马歇尔大道铁路建设计划的破灭 / 242

第十一章

湛江解放与湛江新港的诞生

- 第一节 湛江解放与湛江人民的支前工作 / 246
- 第二节 解放初期湛江的港航业 / 248
- 第三节 湛江新港的诞生 / 250

第十二章

新港晨曲

- 第一节 湛江新港使用前的准备 / 260
- 第二节 湛江新港的投入使用 / 261

第十三章

港口加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

-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湛江港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 266
- 第二节 港口管理体制改革 / 267
- 第三节 湛江港集装箱运输起步 / 269

第十四章

新世纪 新飞跃

- 第一节 加快港口建设与发展 促进湛江市经济全面提速和
加快崛起 / 272
- 第二节 湛江港经营环境有了新的改善 / 274
- 第三节 湛江港改制后资产经营及变动情况 / 275

第四节 三大工程在湛江港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 280

第五节 湛江港企业整体改制 / 283

第六节 湛江港跨入世界亿吨大港行列 / 285

第十五章

湛江港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基本内容 / 294

第二节 中国与东盟的物流现状 / 295

第三节 湛江对接和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 297

第四节 湛江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定位 / 298

第十六章

携手创造港口经济发展新时代

第一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合作及《湛江宣言》发布 / 306

第二节 湛江已成为北部湾沿海首个年吞吐量2亿吨的港口城市 /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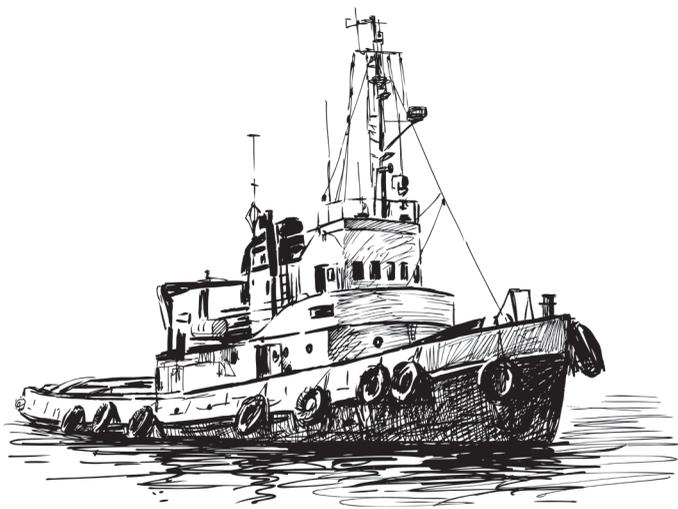
第三节 湛江在加强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上大有作为 / 307

第四节 前景展望 / 311

参考文献 / 316

后 记 / 319

· 第一章 ·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第一节 汉武帝平南越

尉佗自秦末建立南越国，势力越来越强大。汉初兴，因为中原百姓劳顿困苦，所以汉高祖放过了赵佗，没有攻杀他。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遣陆贾去南越，命令赵佗因袭他的南越王称号，同他剖符定约，互通使者，让他协调百越，使其和睦相处，不要成为汉朝南边的祸害。南越边界北与长沙接壤，南接南海东南亚。赵佗之孙赵胡当南越王后，民间与海外的交往渐密，舶来品充斥王宫。至赵胡死，婴齐代立；南越王婴齐死后，赵兴代立。其相吕嘉乃三朝元老，宗室当官为长吏者70余人，儿子均娶越王女为妻，女儿则尽嫁越王王子或越王宗室，与苍梧秦王也有牵连。吕嘉在朝中权势极重，在南越国的威望比越王还高。越王数次上书向汉帝称臣，要求内属作为诸侯国，吕嘉数次谏止，越王不听，吕嘉因而有了叛心。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国相吕嘉在番禺（今广州）发动叛乱，攻杀了南越王赵兴、王太后及汉使者，立明王与越妻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越王。当年秋天，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今湖南桂阳县），下湟水（今连江，即沿今连县、连江县南下）。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今江西南昌附近），下浈水。归义越侯严出零陵（今湖南零陵县），下漓水，甲为下濂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柯江。咸会番禺”。^①兵分五路前往平乱。平越大军主力分别从江西、湖南向广东进发，又沿湘水入广西，经梧州循西江直奔番禺。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先陷寻陕，破石门，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至，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吕嘉城守。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伏波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驱而入伏波营中。

^① 《汉书·地理志》。

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伏波遣人追建德、嘉至海陵岛，海路达200多公里，可见“越王大舟”^①也是适应航海的，只是不如楼船快捷。

番禺既平，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率楼船大军沿海南下，顺海流来到今湛江海面登陆驻师于铁杷溪北岸至武乐溪东岸一带休整。“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百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②以南越地原来的南海郡、桂林郡及象郡部分地域划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其中合浦郡在今湛江、北海、钦州一带，郡治徐闻。七郡既平，已无后顾之忧，官兵们在营地跳起了欢庆胜利的舞蹈，武乐溪就是因此而得名的。^③

三天后，大军继续沿海南下，不久到了雷州半岛南端，一方面在今二桥、南湾村一带，即后来划为徐闻县治及合浦郡治的地方构筑障塞，另一方面加紧收复海南岛的军事准备：修理破损的船只，补充给养和武器，向当地民众了解海峡潮汐和岛上的敌情等。楼船大军全力投入收复海南的准备工作中。

收复海南的日子终于到了，楼船大军在冠头渡至逸角场一带启航，千船竞发，横跨琼州海峡，奋勇向对岸冲去。大军到达对岸今铺前镇北部海滩后，将军依背水一战之计，置之死地而后生，下令将舟船焚毁。焚船之处附近有一座山，即后世所称的“焚楼山”。楼船官兵既无退路，无不奋勇争先。不日间，便会师于儋耳，全岛宣布平复。^④北宋刘谊的《平黎记》也有一段：“汉武帝发兵，南来到雷州海岸，造楼船，渡兵过海，上岸。黎人并不出降，亦无兵粮。李将军于琼州海岸，焚舟而回。今号为焚楼。”明朝方志上说，渡兵是在烈楼港，此港在“（琼山）县西二十里（1里=0.5公里）。

① 《南越志》记载云：“越王造大舟”。

② 《水经注·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志》。越王，即桂林王。另《史记·南越列传》索引谓赵佗破象郡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故二使原为赵佗时所设典主交趾、九真二郡的官位，路将军平南越时改二部为二郡，二使改作汉制太守；古雷州半岛产牛，二使就地取材作为礼物。

③ 《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零四记载：“铁杷溪在遂溪县东南（今湖光镇一带）……相传汉元鼎中路博德讨南越，当驻师于溪北岸。”

④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遣使自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一千里，略以为珠崖、儋耳二郡。”

自徐闻那黄渡开船，小午即到。乃汉军渡海之处。海边有大石一所，生出海北三墩，名曰烈楼嘴。海南地接徐闻，此最近，舟一朝可达”。此言说的登陆点是在今海口市西的长流地区。烈楼之名，人们都说是汉军坐楼船登陆，下令以烈火烧毁楼船，以绝后路，鼓励兵士背水作战，志在必得。^①“海北三墩”即汉徐闻港的屏障三个小岛，今名同，徐闻火车轮渡亦始发于此。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遂定海南，以其地划为儋耳、珠崖二郡。杨仆在儋耳修筑了郡城。

“既灭南越……于是塞南越，禘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属不用。”^②指南越要地建立障塞，设防戍守。日南等障塞当建于此时，今徐闻二桥亦仍留下障塞遗址；白雉又名白鹇，自周成王时就作为贡品，十分难得，但湛江属地石城一带，古时却有出产。

楼船将军杨仆从平南越的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跨海航行经验。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攻打卫氏朝鲜时，特别起用了楼船将军杨仆，“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即从山东半岛跨海航行到朝鲜半岛，跟从其赴朝鲜作战者5万人。

第二节 徐闻港的兴起

古徐闻县含雷州半岛全境，包括今湛江市大部分区域。湛江市属各市

^①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武帝平南粤，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朱崖、儋耳二郡。”“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百粤故地》：“乃自徐闻渡海，略地置朱崖（珠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

^③ 《汉书》卷二十五。

^② 《高州府志·土产》。

县，近30年来相继发现4000~8000年前的文化遗址。位于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边田垌中的鲤鱼墩，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贝丘遗址，面积约1500平方米，因形似鲤鱼用贝壳堆积成小墩而得名。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35米，上层为灰黄土杂以贝壳，含有红陶衣陶片；下层为灰黑土，逐渐往下为棕红色，与贝壳混合堆积，出土文物有夹砂陶器碎片、敲砸贝类的石锤、石砧、小型磨光和穿孔的石器、陶纺轮及牛、鹿等野生动物的骨、角，磨制成环形的鱼脊椎骨、贝壳饰物等。2003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和遂溪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发掘，在鲤鱼墩遗址一共发掘了8座屈肢（体）墓葬，其中有5座是比较完整的。这是近20多年来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标本，尤其值得关注。8座墓葬中，有3座为成年男性，2座为成年女性，男性为仰身安葬，女性则为侧身安葬。据悉，8座墓葬中有5名墓葬主人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生活在距今大约7000年以前。据考古人员称，从出土的骨架来看，墓葬主人的眼眶凹下较深，阔鼻，鼻梁较塌，颧骨突出，这与广西人的体质特征比较接近。所以，有关人员初步推测，这些墓葬主人可能是在7000年前迁移到遂溪以打鱼为生的广西人种。但笔者认为，从遗传学迹象看，该广西人种更有可能是广东人种迁移过去的，有的又从广西迁返广东。河姆渡古越氏族也有这种回归现象。考古发掘人员在遂溪县鲤鱼墩一共发掘了面积为629平方米的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层5层、房子2座和陶、石、蚌器等物品一批，距今年代为3500~8000年前。据初步比较，考古专家发现该时期的陶器与越南、广西距今7000~9000年前的文化面貌有共同特征。说明至少8000年前雷州半岛已有古越人居住。这些遗留下的历史文物，为研究粤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李辉博士对百越的遗传结构成因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进行精细的分析，得到百越民族系统遗传结构的三个特点：①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②百越二分为以浙江为中心的东越和以版纳为中心的西越；③百越群体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由广东向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

向迁徙。百越的血统只有一个主要来源。遗传标记第一主成分分布中心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最有可能是百越民族血统最早的发源地，而后渐渐向四周扩散。

1983年1月，徐闻县文物普查队在徐闻华丰岭出土的新石器晚期遗址采集到双肩石斧、石铤石凿、敲砸器、穿孔石器 etc 共80多件（属新石器晚期文物，见图1-1），同时采集到灰褐色或灰色素面夹沙陶釜（残）多件，经省文物专家鉴定此处为大型的新石器时期生活遗址。

南人善水。鉴江下游曾出土古越人汉代独木舟。考古发现东汉至魏晋间鉴江河畔石宁古独木舟工场已能制造大型独木舟（长6.2米，宽0.5米，深0.2~0.3米）。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是南越国与南海诸国交往的必由之路，由渔而商，“蛮夷贾船”的出现是必然的事。

古徐闻港在汉置徐闻县之前已经形成，有学者认为，形成的时期在汉代以前甚至春秋战国。^①2006年徐闻港三墩海域出土的战国铜甬钟佐证了这一观点（见图1-2）。

西汉时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是到东汉时才普遍应用。从



图1-1 华丰岭山岗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① 杨少祥：《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出土文物看，西汉武帝时的船舟虽已有锚碇和舵，由于未掌握风帆航海技术，必须利用海流。因为长途航行不可能全靠人力划桨，所以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航海时白天观日并观察海岸标志，晚上靠观察星象，因而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受暴风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

广东近岸海流分布比较复杂，尤其是粤西沿海海流状况更为特殊。海流分为潮流及余流。余流包括风海流、地转流、径流、密度流等。雷州半岛附近海区的海流主要受太平洋潮波、河口径流、近海漂流、地转流及海岛地形等因素的控制。

西太平洋的潮波，受地形的影响，经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传入南海时分成两支：一部分向台湾海峡传播，大部分沿华南大陆架做弧形方向传播，在汕头至湛江沿岸形成一股常年的西南恒向海流；在北部湾则形成一股西北向的海流。

受季风影响，南海海面风海流又呈现以下特征：粤西沿岸全年为西南向海流，平均流速夏半年（4~10月）约0.4海里，冬半年（10月至次年4月）约0.5海里。粤西近海冬半年以西南向海流为主，平均流速为0.5~0.9海里；夏半年为东北向海流，平均流速为0.5~0.8海里。湛江港近海全年有反时针环流出现，流速较缓慢（0.3~0.5海里）；而冬半年在存在反时针环流的同时，沿近岸有西南向海流。因此雷州半岛东海岸沿岸冬半年适于船舶南下，夏半年南下船舶会遭遇逆流。

从水道情况看，广东沿海潮流流速最大的是琼州海峡东口中水道，该水道宽6600米，平均水深50米，而琼州海峡西口北部水道宽仅1100米，平均水深40米，形成一个东宽西狭的大喇叭口。东口潮流最大流速达每秒2.04米，西口潮流最大流速每秒仅为1.53米。琼州海峡东西潮汐差异很大：东口潮日均涨落4次，西口却日均涨落2次，汉徐闻港（今徐闻二桥一带）成为潮汐变



图1-2 徐闻出水战国铜甬钟



图1-3 徐闻灯楼角分水线，左面海域为琼州海峡，右面海域为北部湾

化的缓冲地带。另外，受季风控制，夏半年在北部湾形成逆时针环流。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琼州海峡出现了奇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当琼州海峡海潮从东向西奔流而来时，北部湾环流却造成一股自西往东的涌浪，两股反向的海流在徐闻灯楼角处汇成一道分水线，由东口驶来的船到了这里便会被逆流顶回头（见图1-3）。灯楼角一带的半岛状沙丘，实际上也是这两股逆向海流冲积而成的。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绘制的《广东舆地全图》徐闻县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关湫尾还是一个小岛，现在也仍然叫角尾墩，但现在已让海潮冲击连成半岛了。这些特殊的海流，给沿岸航行的西汉海船造成极大的困难。

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南海10月、11月为东北季风可能发生期，12月至次年2月达到鼎盛期，3月、4月为可能发生期；西南季风5月、6月、9月、10月可能发生，7月、8月为鼎盛期。受季风控制，南海北部海流秋冬呈西南方向漂流，夏季为东北方向漂流并在北部湾形成环流。当海上风场稳定时，浅海余流主要以风海流为主；当风力较弱时，浅海余流以地转流为主；当风海流和地转流二者方向相同时，会出现流速较强的沿岸流；当风海流和地转流二者方向相反时，沿岸流较弱。图1-4、图1-5分别为南海东北季风鼎盛期和西南季风鼎盛期时的表层海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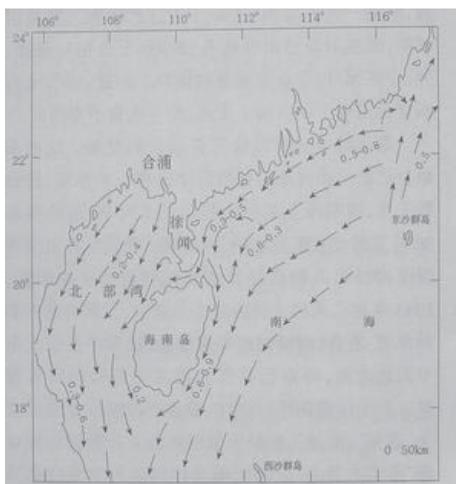


图1-4 南海北部1月表层海流图（流速单位：K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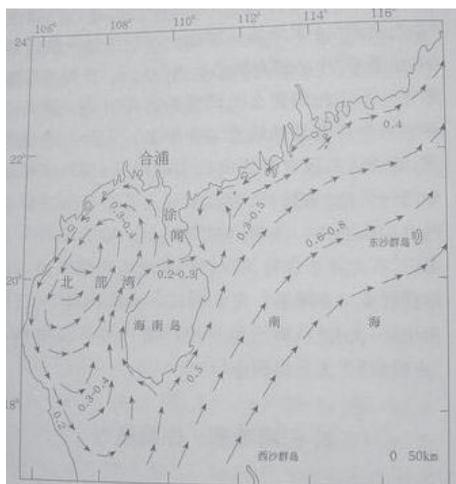


图1-5 南海北部7月表层海流图（流速单位：Kn）

从图1-4中可以看到，如果在东北季风期从徐闻入海，船舶将被海流冲经海南岛西岸而进入南海大洋中，无法沿北部湾东岸行驶到达东南亚各国。宋代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中记载：“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西汉武帝时船无风帆，船入三合流，即使得风也无用，难逃“瓦解”之厄运。侥幸逃出生天，在南海大洋中费时日久，如遇风暴则避无可避，也会导致船毁人亡。从图1-5中可以看到，如果在西南季风期内从徐闻入海，船舶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仍然会被北部湾环流带回到始发港徐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一障碍并利用信风海流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雷州半岛西南端选一港址作为第一始发港，在这里集结并观测季风。当每年10月东北季风起之前10天左右，船队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的合浦港候风。待东北信风一起，船队即可从第二候风港合浦出发，顺风顺流通行无阻地沿北部湾西部、越南东岸航行到金瓯角。这就是当年有了第一始发港徐

闻，还需有第二候风港合浦的真正原因。这也说明了当时我国对信风、海流的观测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第一段航程海流据南海海洋局实测流速为每小时0.3~1.5海里，通常为0.5~1海里，须用2个月才能到达金瓯角。泰国湾冬季有一股逆时针的环流，北半部流速每小时0.4~0.8海里，南半部流速每小时约0.5~1海里，西汉船从金瓯角出发，顺泰国湾环流及南海冬季海流沿岸行驶，经马来半岛东北岸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这一段航程按流速推算需近2个月的时间。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共长650海里，全年都有一股西北向的恒向海流。在南海及北印度洋的东北季风期间（12月至次年2月），这股恒向流最强；在西南季风期间（6~8月），这股恒向流最弱。海峡流速为每小时1~2海里。因此，西汉船队利用海流，十多天可以到达都元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部）。徐闻至都元国沿岸航程约3400海里，历时5个月，平均每天约22海里，平均时速近1海里，也正是海流的平均速度，可见西汉船队沿途除了短暂靠岸加水补充给养外都是利用海流流速航行。西汉时徐闻港同时又是一个军事重地，担负监视海南岛和交趾、九真、日南各郡越人动静的重任。

在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下，谁也没办法随意在任何季节凭借海流一气呵成地从广州把船开到北部湾北部沿海，并持续开往东南亚。如何克服沿岸海流给远航西方船舶带来的极为不利的影晌？在汉徐闻港候风是最明智的选择。这就使汉徐闻港有机会成为海上丝路的一个最重要的始发港。

第三节 徐闻汉遗址的发现及出土文物

20世纪70年代初期，广东省考古部门和有关单位对汉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挖掘，1997年《考古》第4期登载的广东省博物馆报告（执笔者：何纪生、吴振华）《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中对

此进行了披露：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槟榔埭村三地发掘了五十一座东汉墓，其中华丰村三十四座，红坎村十二座，槟榔埭村五座。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地区博物馆黎智波、钟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开潮、吴增、姚秀琴等同志。在五十一座墓葬中，四十五座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墓。另六座是砖石合构、石室和土坑墓，全在华丰村。墓门基本朝南，墓室都很狭小，最大的墓长3.6米、宽2.04米，最小的墓仅长2.14米、宽0.8米，高度都在1米左右。墓砖个小体薄，一般长22~24厘米、宽11~12厘米、厚2厘米。砖几乎全是红黄色，粗松易碎，少量在平面上印米字、方格或菱形花纹。砖石合构墓和石室墓数量不多，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砖石合构墓顶部用砖起券，四壁和底砌大块的长方形石板（也有个别墓用砖铺底）。石室墓全用石板搭盖，呈立体的长方形。石板采自附近海里的珊瑚石，厚约6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在墓里全被积土压成小块。出土遗物计有：陶器一百零三件，陶珠七十八个，铁器二十六件，铜器八件，五铢钱十枚，银饰四件，珠饰三百零八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二件。

砖室墓大都双层砖，壁砖砌法是顺砖和顶砖相间，一般平砌二三层顺砖后放一层丁砖，交错向上，到上部全为顺砖，逐渐内缩向顶起券。墓底铺砖一层或二层，采用二横二直相间或曲尺形的砌法。封门砖的砌法和壁砖相似，但较为散乱。

随葬器物大都放在墓室西侧，少者放在两角，多者列成一排。陶釜大都置于西北角。陶珠和珠饰大多出在墓室中部偏北处，有些还混在一起，应是颈下饰物。

陶器全是实用品，不见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细泥，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只有红坎村出的小钵挂青绿色釉。夹砂陶器仅釜一种，应为炊器，青灰色，出土时难以完整取出。陶器纹饰简单，最

多的是方格纹上加盖长方形戳印，此外还有弦纹、水波纹和篦点纹。器形以罐为主，还有釜、盆、圈足盆、钵、小钵、小釜等。

釜，二十一件，一般一墓出一件，侈口宽沿，束颈圆底；有的宽沿中间微凹，唇向上翘。

方格纹罐，三十一件。这是墓中最具特色的陶器，大口，反折唇，短颈于底，器身和花纹又分三式：Ⅰ式十九件，长身，最大径在肩部，器形大小不一。腹以上饰方格纹，加印一至二排长方形戳印，印纹清晰整齐。Ⅱ式三件，矮身鼓腹，最大径偏于器身下部。腹以上方格纹印痕深，线条也粗，中间加印一排方形戳印。Ⅲ式九件，器身长宽比例介于Ⅰ式和Ⅱ式之间，口较小，颈略长。挂黄褐色薄釉，方格纹印痕不明显，肩腹部划弦纹。

罐，三十六件，分四式：Ⅰ式十七件，器身和Ⅲ式方格纹罐相似，肩腹部划弦纹，有二件在肩部加双横耳。Ⅱ式六件，圆唇，沿下凸出棱线，里面形成凹槽。鼓腹平底，器身矮胖。腹部划弦纹，肩有双耳。Ⅲ式十一件、直口、反折唇，器身较长。罐制作粗糙，表面经修削，无釉。肩部划弦纹和水波纹，双耳宽大结实，异于其他罐。另有一件直口方唇，颈外有三道凹槽，肩部施一周篦点纹，制作甚粗。Ⅳ式二件，圆唇，沿下凸起棱线，器身长大，四耳。一件肩部饰方格纹；另一件饰篦点纹，口径19厘米、高36厘米。

盆和圈足盆，八件，大小不一。广口圆唇（有的唇外折），束颈平底。二件圈足盆是在盆底加喇叭形圈足。

钵，一件。直口微侈，腹下部内折成小平底。

小钵，三件。器形和盆相似，只是颈不内缩，器形也小，口径10.5厘米、高3.5厘米，挂青绿色釉。

小釜，一件。侈口束颈，鼓腹平底。

器盖，二件。一件出于残墓，盖顶有半环钮，可能是壶盖。另一件是用圈足盆的圈足改制而成，说明墓主甚贫苦。

陶珠，七十八粒，出自二十一座墓。珠剖面呈菱形，径2~3.5厘米，中有圆孔，仅一个施篦点纹，其他均素面。

铁器，二十六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发钗、指环等。

斧，五件。略呈长方形，刃部弧圆，上部两侧卷起成釜，内有朽木。其一长15厘米、釜部宽5厘米、刃部宽7厘米。

凿，二件。梯形长条，圆釜，刃部扁平，釜内有朽。

刀，十件。长条形，脊厚刃薄，锋端斜出，后端有的细长，装木柄，有的是环首，长21厘米、宽1.2厘米。有一件长41.5厘米，锋端齐平。

此外有鱼钩一件，有倒刺；发钗一件，马鞍形；指环一件。另有六件残甚，器形不明。

铜器，八件，有盆、碗、镜、器盖和镞。

盆，一件。广口宽沿，腹较浅，平底。盆两侧有铺首环耳，耳铜铁各一只，耳上部饰弦纹。盆壁甚薄，口部有焊接的补丁两处，应为实用器物。口径38厘米、底径20厘米、高11.5厘米。

碗，三件。敞口直壁，平底、口径14厘米，底径8.5厘米，高6.5厘米。

镜，一件。桥钮，圆钮座，钮外一周连弧纹和栉纹，窄边。镜残甚，铭文圈内有四乳，铭文难以辨认，字体较方，应为昭明镜，直径8厘米。

器盖，一件。似为壶盖，出自残墓。

镞，二件。三棱形，后镞中空，残长2.5厘米。

五铢钱，十枚，锈蚀严重，仅能辨识文字，属东汉。

银器有手镯一件，指环二件。

珠饰共三百零八粒，大小形状不一，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

有肩石斧二件。一件灰白色，扁平，刃部两面磨光，长6.5厘米、宽4厘米。另一件也是两面磨光，青灰色，长7.5厘米、宽3.5厘米。这类磨光的有肩石斧在广东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常见。墓区附近虽然未见遗址，由于石斧是出自填土中，可能不属墓中的随葬品。

墓葬的时代和特点

这批墓葬和广东、广西其他地方的东汉墓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特点。

在墓室结构方面，砖室墓全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这是广东东汉砖

室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广州曾有少量发现，时代属东汉前期，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前后，使用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徐闻这种砖室墓出现的时间应与广州的大体相近，只是数量多，延续的时间也长，到东汉后期仍见存留。这种墓在广西合浦也有发现，当时徐闻县和合浦县同属合浦郡，文化面貌更相接近。至于用珊瑚石板建筑墓室，其他地方尚未见过。据当地群众说，徐闻的泥土难以烧制砖瓦陶器，目前农村也是用花岗岩石块砌墙，可见汉代用珊瑚石板建墓是因地制宜的办法。

随葬品数量不多，墓3出土的陶器盖系用圈足盆的圈足改制而成，墓12的铜盆经过几次焊接修补。出珠饰的墓虽多，但每座墓的数量都少，且伴出陶珠。随葬器物中还有一批铁斧、铁凿、铁刀、铁鱼钩和铜镞等工具、兵器，这种情况反映出墓主人的阶级地位应属社会底层，可能是比较贫苦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或士卒。墓内不用陶制模型明器陪葬，说明这种风气尚未在徐闻流行，与广州、佛山、韶关等地有很大的差别。

墓中普遍陪葬方格纹陶罐，这又与广州等地不同。在陶罐上拍印方格纹加盖长方形戳印作为装饰，广州地区出现并盛行于西汉前期，东汉前期已极少发现，其后趋于消失。在广东连平、韶关、佛山等地和香港的东汉砖室墓中虽然也有出土，数量都不多。而徐闻华丰村，在二十五座未受扰乱的墓中（内有四座墓无随葬器物）就有十四座墓出方格纹陶罐，在各种陶器中所占比例最大。在广西合浦的汉墓中也出这种陶罐，而合浦地区、湛江地区和海南岛的汉代遗址中，这些方格纹上加戳印的硬陶罐残片更是常见，说明东汉时期它是这一带居民喜爱的陶器装饰花纹。

槟榔埭村的墓38出土一面体小质差的昭明镜，字体较方，减字甚多，当属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在华丰村、槟榔埭村出土的铜盆、铜碗，也是广州地区东汉前期墓内常见的器物。五十一座墓共出土二十六件铁器，总的看比例不大，但是其中红坎村墓47就占十四件，说明东汉时铁器在徐闻已普遍使用，才较多地埋入墓中。

红坎村出土的陶器与华丰村的有些差别，墓47的三件小陶钵挂着绿色釉，这是广东地区东汉末至东晋、南朝墓中常见的器物。红坎村出土的方格

纹陶罐也少，在十二座墓中仅墓51出土二件，其他陶罐施水波纹和篦点纹，都是年代比华丰村墓较晚的特征。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徐闻这批墓葬应属东汉，华丰村、槟榔埭村的墓具有较多的东汉前期特征，红坎村的墓年代稍晚，当属东汉后期。总的说，徐闻墓和广州墓在文化面貌上大体一致，但延续时间较长，如广州西汉墓的一些特征在徐闻墓中仍见存在，而东汉前期的特征，在徐闻又延续到东汉后期。”

徐闻县城建于西汉，上述遗址显然还不足以证明是徐闻县城西汉遗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汉书·地理志》虽未明确指出首县即是郡治，但从其记载体例来看，首县徐闻即是合浦郡的郡治无疑。如果徐闻不是郡治，与县令同级的左右候官也不可能同设于此。

一、西汉徐闻县城遗址到底在哪里？

明万历《雷州府志》“建置·城池”条记载：“徐闻县城。汉元鼎置县海滨讨网村。”按清嘉庆《雷州府志》和宣统《徐闻县志》“建置·城池”条所记，与明万历《雷州府志》完全相同。

《元和郡县志》（金陵书局校刊本）：“徐闻县，下。案本汉县名……县南七里，与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对约百里。”此处“县南七里”指唐徐闻县治麻鞋村南七里为汉徐闻县治。

按《元和郡县志》提供的线索，从文海村向南走6~7华里（1华里=0.5公里），到达海边，这里是今徐闻县五里镇的二桥村和南湾村，左有南山村，右有仕尾村，后为海边台地，隐约可见夯土城墙残址，前面原是一天然良港，现已部分淤积，远处海面屹立三个小岛，名头墩、二墩、三墩。头墩有古井一口，石砌，已废，经掏挖，井底仍有少量淡水渗出。调查所见，与志书关于讨网村“前临海，峙三墩，中有淡井号龙泉”的记载相符。



图1-6 西汉徐闻港遗址鸟瞰图（陈立新/摄）



图1-7 二桥南湾村夯土(垫石)城墙残址剖面（陈立新/摄）

1983年3月，文物普查队首次考察仕尾村遗址，由于1958年堵海造田，仕尾村北面山坡被移去打坝，致使地面文化层破坏严重。仅东、西两侧断崖仍裸露明显的文化层残迹厚约30厘米。在遗址腹部发掘，发现距今表土30~40厘米深处有红砖块、板瓦、瓦当以及印纹陶片。

砖诸种（均残）其一，宽12.7厘米，厚3厘米，饰粗方格纹，色淡红；其二，全红，厚2.5~3厘米，亦饰粗方格纹；其三，灰褐质，板瓦，灰白色的较多，均残，面弧形，厚2.2厘米，无纹饰。另间有红色板瓦两种，一种厚1.4~1.8厘米，饰细绳纹，残长残宽不等。

筒瓦残，呈灰色，有两种，皆有唐代流行的莲花瓣纹。

陶片，分红陶、灰色陶两种，红陶稍少，多素面，质地疏松，个别饰方格纹、弦纹；灰质陶饰弦纹、网织纹。

在仕尾路东侧存一饮马池，用一巨石雕制而成，呈八角形，八棱尺寸不等，直径2米，深40厘米，池口高出地面0.57厘米，边沿严重磨损，多处出现凹痕。初步鉴定为唐代文化遗存。^①

1988年11月，在二桥、仕尾、南湾村有所发现。一是在二桥村学校谷场发现一条自东南向西北延伸的约70米板瓦、红砖分布带。二是在该分布带中段村民潘校的宅基地，仍散布着很多在他挖墙基时挖出的绳纹板瓦分布带。三是在南湾村西北约100米长的海滩，发现网织纹红陶和红土质、灰质绳纹板瓦。四是把考察范围向西北、东北扩大时，又发现从仕尾村西到二桥、南湾村北约22万平方米地表层均有大量绳纹、布纹红胎板瓦、筒瓦、网织纹、米字纹、方格纹和圆形、菱形、方形戳印的灰色陶片以及一种典型的与陶器纹饰相似的米字纹、方格纹加戳印的印纹红砖。五是在二桥、南湾外围的东岗岭和北面的凸岭仔上发现较多的印纹陶片和小薄红砖片。从群众中也收集到弦纹、鼓腹小陶缸，为当地农民劳运明捐送，他于1960年拾取于东岭仔。当时是挖排洪渠时发现的，证明该地有汉墓。

1988年11月在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后坡发现汉置徐闻县治遗址。湛江考古部门发布的消息称：“治所遗址位于台地南部，坐北向南，不筑城垣，只

^① 吴凯：《古冢夕阳华丰岭》。

堆土垒石为基，类构山寨，以为镇守。主城寨基犹存，残宽3.5~6.8米，残高0.6~1.25米，实测南北长95米，东西宽85米，周长360米，呈方形，面积8075平方米。主城寨南面，紧连第二台地遗址，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现为二桥村庄。”

编者认为，考古人员所做出的该地点为汉置徐闻县治遗址的判断是可信的。可能有的人会怀疑：一个郡县古城的规模怎么会这么小？我们且来做一个比较：

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平定南越后，被武帝封侯。9年后的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路博德坐罪贬为强弩都尉，调守西域居延郡。史籍记载路博德“筑居延城”。考古发现居延郡最大的一座古城址城墙南北长130米，东西宽127米，最高处5米。墙身夯筑，宽3.3米，夯层厚12厘米。考古工作者认为此为居延郡城址。而候官治所就要小得多了，如考古出土的其中一候官治所：郭址用土坯砌成，每面长23.3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坞位长47.5米，宽45.5米，土坯墙厚1.8~2米，残高0.9米。居延郡地处西北边陲，当时驻军比南方的合浦郡要多得多，其郡城理应比合浦郡首县徐闻县城要大一些。上述两地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一，两地的最高长官都是路博德；其二，两地的城都是在路博德到该地以后才兴建的；其三，两城建设的时间十分相近。从建筑工艺上看，亦非常一致，都是用夯土形式。从城墙宽度上比较，徐闻二桥古城遗址为3.5~6.8米，居延城遗址为3.3米，徐闻略胜一筹。从面积上看，徐闻古城长度比居延城仅短37米，城宽短42米，面积约为居延的一半。武帝时合浦郡、居延郡都未设太守，由都尉治理，郡都尉下设左右候官。按汉官制，候官级别相当于县令。而徐闻古城遗址约为居延候官坞位的4倍。可见徐闻二桥古城遗址是符合当时的都尉治所规模的。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夯土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已达到成熟阶段。汉徐闻城遗址当是伏波将军路博德带领的中原大军将此技术应用的结果。这与《汉书·贾捐之传》中“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的记载也完全吻合。

1989年10月15日，合浦县博物馆陈瑞业等三位同志和徐闻县博物馆联合考察二桥、仕尾村。在二桥西南与南湾村交界的斜坡处，发现两段典型的

夯土层，一段长约8米，文化层次分明，分风化层和壤土层，共七层，壤土层厚12~14厘米，暴露的文化层高达90厘米。另一段在东翼，由于塌方而发现，文化层长约5米，高1.4米。

在二桥村潘家连（五里中学教师）院前蔗园采集到筒瓦一件，残长27厘米，宽17厘米，内径13厘米，厚20厘米，淡红胎质，面绳纹，底布纹。

1990年5月31日，省文化厅副厅长兼文管办主任徐恒彬，文物科科长尚杰，省考古队队长朱非素、副队长邱立诚，市博物馆馆长阮应祺、钟绍益、吴锡慧和县文化局、博物馆再次对二桥、仕尾、南湾地区进行地面文物考查。省文化厅徐恒彬副厅长采集到一个较为完好的“万岁”瓦当。



图1-8 “万岁”瓦当

文物考查队在二桥村潘宅祠堂院子东南角，发现唐代石井台，大理石质，全石雕刻而成，四方棱台形，南北侧下底72厘米，东西侧下底为74厘米，上底64厘米，高16厘米，南北两棱台面饰倒挂莲花大瓣纹5瓣，瓣上端6.5厘米，下端7.5厘米，两瓣中间夹饰小瓣纹5瓣，东西棱台面饰倒挂莲花瓣纹6瓣，两瓣中间夹饰小瓣纹6瓣。井口圆形，径45厘米，井内三排石头砌构，距水面约6米。

在二桥村潘校屋后，潘家连前院东西走向112米，南北走向105米，计11760平方米的台地，发现大量筒瓦、板瓦残片。

筒瓦、板瓦，红胎质，面弧形饰绳纹粗细饰纹分8种，内饰小乳钉纹，纹径3毫米、4毫米、5毫米、7毫米、10毫米无规则排列，另内饰大乳钉纹，纹径13毫米，无规则排列，共计5种。

陶器残片，灰质，方格纹加菱形、双菱形、圆形戳印。同时收集到小陶缺一件，高55毫米，口径30毫米，双扁耳，灰胎质，最大径在腹部，径85毫米，平底径45毫米。

在仕尾村北南山堰堤路北排水沟下，发现瓦当滴水一件，筒体，残，灰胎质，面尚完好，外径14.6厘米，三道圆廓线，首道粗宽，内双廓线疏单，内廓径10.5厘米，中饰双圈乳点纹，以双对角线呈十字对称隔开，左右饰双

山纹，上下饰汉篆“万岁”两字，字大4厘米×2.8厘米。“万岁”文汉瓦瓦当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证实在当地必定有级别不低的行政管理机构——官衙之类的古建筑。是否为汉置左右候官的居所，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讨。总之，这一建筑构件的发现，填补了徐闻县汉代文物缺乏铭文的空白，又为汉徐闻城、徐闻港的定位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证据。它与广东省五华县华城狮雄山西汉早期建筑遗址，1983年澄海县发现的上华东溪河西岸龟山的西汉生活遗址，1985年乐昌县城郊武水南岸发现的西汉早期生活遗址有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都出土粗绳纹、带乳点纹板瓦、筒瓦、方格纹加戳印陶缸，可进行可靠的年代比较和印证。

199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在二桥、南湾村海边台地进行联合考古发掘，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西汉遗址，出土了2件同类残缺的“万岁”瓦当、卷云纹瓦当和大量的造型纹饰多样的汉砖汉瓦。“万岁”瓦当面直径14.5厘米，边轮宽而突起，外圈与内圈间用十字形双线分为四格，上下格阳纹篆体“万岁”二字，左右格饰“山”字形双线卷云纹，年代据省文物部门鉴定为西汉中期。发掘报告认为



图1-9 汉徐闻县遗址联合发掘现场



图1-10 灵芝纹瓦当和菊花纹瓦当

“该遗址的年代上限为西汉早期，下限为西汉中期”，“是广东省境内已发现的十处汉代建筑遗址之一，其级别应属县治以上”，并认为该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史料记载的汉代徐闻县城“相吻合”。关于这次发掘的情况，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联合发掘情况简报《徐闻县汉代遗址的发掘》一文中做了详细披露。

宋代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二雷州“事要·徐闻交易”条下引唐《元和郡县志》（今本不载）：“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交易。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宋代另外两部著名的地理总志，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一百一十八雷州“风俗形势”条和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雷州“土产”条，也有与《方輿胜览》上引《元和郡县志》全部或部分相同的内容。按“候官”是汉代置在边境地区的军事机构，尽管它未必负责商业贸易，但官署周围成为中外商业交流的市场却是完全可能的。

“欲拔贫，诣徐闻”这一谚语，应当是在徐闻经商致富的人先说出来的。这一谚语能够传至唐代使高居庙堂的李吉甫宰相都知道并载入《元和郡县志》，足以使人联想到，它在汉代有着相当大的流传范围和相当长的流传时间。显然，汉代徐闻的对外贸易可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2001年7月2日，在湛江市登陆的强台风和连续数日暴雨的无情侵袭下，

五里乡堰头岭汉墓群由于水土流失而裸露。为了搞好徐闻县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的科研项目，徐闻县文化局组成联合清理工作组，连续突击对五里乡二桥堰头岭汉墓和城南乡海港西汉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在清理二桥堰头岭汉墓墓道时发现左墓道有人为破坏痕迹，据此判断此墓已于早年被盗，导致穹顶和右侧道崩塌。墓内中部文物大部分被盗，头尾两端仍留有少量文物。徐闻县文化局清理小组共清理出土兽纹铜器2件，铜环4件，五铢钱8枚，陶盒4件，小陶罐1件，陶灶1件（残），陶屋1件，屋内有汉春臼俑2个，还有陶釜、网织纹陶器碎片。同时，工作组还清理了徐闻县城南乡海珠港村西近海断崖处的另一座汉代墓葬，清理出陶屋、陶井、陶杯、铜镜各1件，陶器盖2件，网织纹陶器碎片3件，陶井饰水波纹以及陶器盖饰弦纹。

据有关专家分析说，这两座墓葬出土的陶屋是目前粤西地区发现的最完整的陶屋，二桥汉墓屋里的春臼俑生动逼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是工艺水平最高的陶屋，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出土的怪兽纹青铜器属广东地区所罕见文物。五铢铜钱的发现为汉墓的断代提供了可靠证据。

汉陶罐分多式：其一，在大黄区华丰村东汉墓MP出土，1982年11月23日



图1-11 徐闻汉港遗址出土的陶屋和春臼俑（陈立新/摄）

发现，高12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2.5厘米，腹径17.3厘米，敞口、鼓腹、双扁耳、耳沿饰一道弦纹，灰胎质，施淡青釉，大部剥落，属汉代遗物。其二，1982年6月华建糖厂汉墓出土，华建糖厂职工吴开海捐献，灰胎质无釉，鼓腹平底，高16厘米，口径、底径皆15厘米，腹径19厘米，短颈折唇，腹部饰网织纹加圆形戳印，属汉代遗物。

2002年10月至11月初，广东省徐闻县文化局工作人员先后在徐城南坛园村、五里乡二桥堰头岭和城南乡南珠港村相继发现并清理了四座汉代墓，从中出土的49件珍贵文物中，有汉代双弦纹陶罐、网织纹加圆形戳印罐、铜碗、陶纺轮、玛瑙珠、汉昭明镜、兽纹铜器、铜环、五铢钱、陶盒、陶屋、陶杯等。

在城南乡海珠港村西海断崖处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一件陶屋，是目前粤西地区发现的最完整、工艺水平最高的陶屋，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考古所、市博物馆、县博物馆再次对徐闻汉代遗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发现在西汉早期（相当于南越国时期）的文化地层，发掘出的瓦当与南越国出土的瓦当非常相似。



图1-12 汉陶罐

2004年下半年，徐闻县徐城镇西门村平整场地时，在古道旁发现一座汉墓，是长方形单室券顶墓，长3.45米，宽1.26米，深0.75米。墓砖红胎质，两侧墓道用小薄红砖丁横叠砌，两端用珊瑚石和玄武石块封口。墓内出土的物品有玉石珠饰6件，水晶珠1件，玛瑙珠1件，铁带钩1件，陶纺轮4件，铜项圈1件，铜镜1件，小铜碗1件，五铢钱15枚。

据专家考究分析，这座墓年代为西汉，墓主为较富有的女性，随葬的珠饰全是舶来品，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这座汉墓是徐闻县城地区发现的又一座较大型的汉墓。

徐闻自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汉墓以来，至今已发现汉墓数百座，主要有8个汉墓群：①海安镇红坎墓群；②城南乡槟榔埭墓群；③城南海港石园墓群；④城南北潭墓群；⑤大黄华丰岭墓群；⑥五里乡港头墓群；⑦角尾乡角尾墓群；⑧徐城镇南坛园墓群。其他发现和发掘汉墓数量不等的地点计有20余处。

诚如杨式挺先生所说：目前出土的“徐闻汉墓随葬品，若与合浦汉墓相比，是无法比拟的。如据华丰岭发掘的51座，槟榔埭发掘约10座和海安红坎村发掘的20多座，合计80多座汉墓的统计，计出陶器103件、陶珠78个，铁器、斧、凿、刀、鱼钩、指环等26件，铜器、盆、碗、镜、镞8件，银指环、手镯3件，五铢钱10枚，珠饰308粒，合计600多件。珠饰308粒，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其他地点汉墓出土的较重要的文物有：龙首柄磁勺（魁），双鱼朱雀纹铜盘、铜鼎、铁釜、铁剑、铜镜、陶牛、陶薰炉、陶井、陶屋、‘张已印’桥纽铜印，墓砖铭文有‘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此外，2000年在大黄乡社郎仔村还出土一面铜鼓，年代可能属西汉中晚期”。“合浦汉墓群规模宏大，埋藏数量多，随葬品丰富多彩。”

其中有几个容易忽视的问题：

第一，徐闻是设置左右候官管理对外贸易的地方，类似现代的海关监管，进口的宝物首先得满足朝廷的需要，走私流失民间的舶来品自然不会很多。舶来品多的地方并不能证明其地位高，恰恰说明其为监管不严的地方。

第二，“欲拔贫，诣徐闻”。徐闻是当时商贾云集的口岸，能流通的舶来品多被商贾收购走，留下的自然不多。

第三，徐闻与合浦汉墓的型制明显不同。合浦汉墓基本是坟包形式，地表上有明显的封土包，易于发现。徐闻汉墓则采取更古老的墓葬形式，葬者，藏也。至今出土的徐闻汉墓几乎全是藏在地表以下，看不到封土包，加上徐闻汉墓群所在地区均属人烟稀少的野地，因而极难发现。相信随着徐闻的进一步开发，更多的汉墓将不断露出真容。

第四，合浦郡治徐闻在西汉，移治合浦在东汉，徐闻汉墓历史更加久远，发现的数量少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县县城东大水桥水库库内发现一处大型的古窑址。据省市县三级考古工作者初步考证，该窑是汉代古窑址。古窑址位于库区东北、红坭砖瓦厂东南的大水上溪西侧，古地名称“落前”。窑场沿溪畔高坡分布，面积约8000平方米。古窑多是“馒头窑”，绝大部分已损毁，现仅存一座保存较完好。古窑全用巨砖和砖红壤构砌，进料口宽80厘米，排风口径80厘米，高度不详。从烧结土层发现，窑群均坐西向东，并且座座相连，自低处向高坡排列。经采集，有石斧、折唇陶罐碎片、水波纹陶片、卷云纹莲花瓣纹滴水、乳钉纹瓦当、菱形铺地砖等，皆灰胎质。还有大量的筒瓦叠烧、板瓦叠烧。出土的大厚红砖，与登云塔砖、古城墙砖相仿。同时，还采集到“马”字陶棋一件，从出土的文物标本可证，该遗址在汉代已有人居住。当地有大量可以作为缸瓦砖原料的砖红壤，前临大水上溪，而且古时这里山林茂密，烧窑的柴火充足。大厚红砖可证，明代徐闻的城墙砖和登云塔砖均在这里烧制。古窑址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才逐渐废弃。该古窑主要产品是砖瓦，佐以部分生活器皿。它的发现填补了徐闻古窑考古历史的空白。

二、唐徐闻县故址到底在哪里？

文献说唐贞观二年（628年），改隋康县为徐闻县，治所由讨网村迁麻鞋村，属东合州。麻鞋村即今芒海村，“芒海”在方言中与“麻鞋”音谐。

南梁时，广州兴建了南海神庙。关于南海神，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根据《山海经》上的记载，尧的儿子丹朱被放逐到南方，成为苗之祖，死后化为南海神；其二是说南海神为楚人之祖祝融，这大约与历史上楚国势力扩展到岭南有关。祝融可以说是南方民族的共祖。徐闻的南海神庙，兴建的比广州还早得多，至迟在东汉时已经存在了。2002年笔者陪同一位同学考察徐闻时，在汉徐闻县旧址二桥村曾发现一块有“帝君百石”拍印纹的东汉地卷砖，是村民从仙人座附近捡回的文物。汉代称“帝君”的神祇不多。传说黄帝属下管火



图1-13 “帝君百石”拍印纹东汉地卷砖拓片（吴凯拓）

的官祝融巡狩南方，祝融称赤帝，是南方的神祇。南方色赤，配雷州赤土，正合五行。汉称官秩百石以下的低级官吏为少吏、掌领春秋飨礼的官吏为卒吏。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的《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中记有“请置百石卒史一人”，作为掌领礼器，“典主守庙，春秋飨礼”的官吏。“帝君百石”东汉地卷砖当是南方赤帝庙百石卒史墓的遗物。

第四节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路的背景

一、重开贡献

汉文帝曾下诏：“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①汉武帝平了南

^① 《汉书·贾捐之传》。

越，文功武治盖过了历代汉帝，为宣扬国威，又恢复了纳贡。汉使出洋的使命之一，当为晓喻各国来献。故有“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之说^①。中印海上航线开通后，中国与北印度洋沿岸诸国及东南亚诸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同时也间接沟通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大秦国（古罗马）的海上交通。据《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土出象、犀、（玳）瑁……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东汉郭宪的《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载：“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1尺=0.3333米），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攀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郭宪曾任光禄大夫，其所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虽非信史，但学者认为书中所述“未必皆为无稽虚构也”（张星娘语）。起码，这则大秦国贡牛的记载，是经得起推敲的。这种花蹄牛产自非洲索马里或埃塞俄比亚，此大秦国贡使也许正好带着花蹄牛到身毒南部的黄支国做生意，到中国后献上了花蹄牛。

《汉书·西域传赞》记载：“孝武之世，巨象、狮子……食于外囿。”巨象汉代交趾各郡多有出产，不足为奇；狮子非中国产物，可能是由已程不国（后世所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经海路运来的贡品。“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黄支国献犀牛。”^②

二、汉武帝求神仙

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找蓬莱仙岛的故事，见之史册，流传民间，世人皆耳熟能详；而对汉武帝求神仙之事，知者就不多了。其实，汉武帝对祈求神仙的狂热，比起秦始皇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汉武帝亲临东部沿海访求蓬莱神人之举便有10次之多。

第一次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亦即平南越后的第二年）春正月：“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汉书·平帝纪》。

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钜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以千数。”

第二次在同年四月：“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结果还是东方朔把他劝止了。

第三次为同年十月：“复东巡海上，至碣石。”

第四次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

第五次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冬十月：“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第六次为同年十二月：“临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第七次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春正月：“上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皆无验，令祠官礼东泰山。”

第八次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春：“上行幸东海。”

第九次在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幸东海，获赤雁。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还。”

最后一次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正月：“上行幸东莱，临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谏，上弗听；而大风晦冥，海水沸涌。上留十余日，不得御楼船，乃还。”这年三月，听从了丞相田千秋的劝告，不再迷信神仙，“悉罢方士”。

汉武帝以一国之君，亲自从事这种虚无缥缈的活动，前后竟达22年之久！而武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好在此期间。二者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呢？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以汉武帝对访求神仙的着迷程度，其派出的汉使下西洋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宣传国威或开展贸易而不身负“求蓬莱神人”的重任，那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笔者经多年求证，发现不少蛛丝

马迹，也许对解开这一千古之谜有所补益：

(1) 史书中多次记载，汉武帝除亲自访仙外，还多次派出大规模的船队入海求神人，如：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神仙，人以千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天汉三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关于武帝多次发船令数以千计的人“求蓬莱神人”的目的地，史无记载，可能是在山东沿海附近，也可能东渡扶桑、琉球。这些地方都找不到仙山，则不排除下南洋、走西洋的可能性，而且西行的可能性最大。凑巧的是，开始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正好在平南越的次年，“数千人”也是大船队的规模。

(2) 从徐闻出发的官方船队，领队译使属黄门，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的行为。黄门本是宫中少府下属掌管御用“乘舆狗马”及皇帝近身内侍的部门。武帝为了能像黄帝一样“骑龙成仙”，曾经派大军去攻打西域大宛国，把传说为“其先天马子”的汗血马夺了回来。这些“天马”，没有交给皇室专设的“上林苑”等处马房饲养，却连同一部分名马一起交给黄门管理。《汉书·西域传赞》有“汗血之马，充于黄门”正是指此。给皇帝赶车的“奉车都尉”、副手“駉马都尉”等都属于黄门。武帝迷信“五行”，受方士所愚，认为是“受命当土德”。“黄头郎”，本是汉代掌管船舶行驶的吏员，后泛指船夫。《史记·佞幸列传》：“〔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裴骃的《史记集解》：“徐广曰：著黄帽也。《汉书音义》曰善濯船池中。一说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黄旄於船头，因以名其郎曰黄头郎。”《汉书·佞幸传·邓通》引此文，颜师古注：“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因为土胜水，土色黄。后来武帝派黄门去主管出洋之事，应与此有关，不外想讨个吉利，希望早日找到神仙。

(3) 在雷州半岛西南端汉徐闻县遗址附近，现在仍有一座“候神岭”，一些考古工作者认为可能是“汉置左、右候官”的所在地。但是候官不是“神”，按西汉官制，只不过是边郡都尉手下的常设官员，亦称“军

候”，秩比六百石，相当于县级，既是哨所组织，又掌兵站设施。以笔者推断，“候神岭”应为汉武帝时“候祠神人”的地方。“候神”一词，常见于与西汉史有关的古籍，如：元鼎四年，武帝拜公孙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大室”；元鼎六年，“公孙卿候神河南”；元封二年春，“使卿持节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太初三年，“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征和四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张谭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重复，请皆罢。奏可”。可见西汉时候神规模之大。成帝时罢了大部分，其中原所设的蓬山、之罘、成山、莱山、仙人、玉女等祠皆在应罢之列：“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在山东之罘、莱山、蓬山等处“候神”，是等待蓬莱仙岛的神人出现；在徐闻“候神”又是等待哪路神仙呢？仍是等候蓬莱神仙。候神岭在古徐闻港（今华丰港海口）岸边，左近还有一地名称为“仙人座”与成帝时所罢的“仙人”候神所同名，是否为同一所，失稽。在“仙人座”附近的海面上有三个小海岛，今名“三墩”。康熙《粤闽巡视纪略》记载：“三墩在城南二十里突起海中，号小蓬山。”又与成帝时所罢的“蓬山”候神所同名。无独有偶，在徐闻至合浦之间的海面上，有两座大海岛，清代张渠撰《粤东闻见录》中说：“遂溪有濶洲、蛇洋洲。二山相峙，旧名大蓬莱、小蓬莱。”《粤闽巡视纪略》记得更详细：“濶洲……古名大蓬莱，有温泉黑泥可浣衣，使白如雪。前为蛇洋洲（今斜阳岛），周四十里，上有蛇洋山，亦名小蓬莱，远望如蛇走，故名。二洲之上各有山阜，飘渺烟波间，可望不可登。”与山东蓬莱仙岛的传说可谓如出一辙。

（4）再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南下，至越南湄公河口有地名瀛洲（今属永隆）。湄公河口南部海面约100公里处有昆仑二岛，最迟在唐时已得名，是否汉名，尚待考证。

（5）在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大秦国（古罗马）的西面，还有传说中的

昆仑山西王母。

(6) 候神方士使者和译长都是汉武帝委派出洋的使者，两家的任务是合二而一还是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必然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为什么诸多的“仙迹”及候神处所均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徐闻和相关航线上，这难道仅仅是以“偶合”二字便可解释的吗？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遗迹很可能是西汉时候神方士使者求神未果，生造出来糊弄皇帝的地名。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武帝的求神仙活动也与南越有关。“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漫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始用焉。”^①宋周去非《岭南代答》记载：“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曰祭天。盖雷州有雷庙，威灵甚盛，一路之人敬畏之，钦人尤畏。”雷庙以雷州最多最大，至今犹存。鸡卜亦雷州传统风俗，宋朝国史院编修官秦少游被贬雷州时，曾写过“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的诗句来描述当地的习俗。“越祝祠”很有可能便是雷神庙，雷州的庙观都有庙祝，庙祝古时由越巫充当。如壮族巫师跳神时唱的《九天赞》云：“我是上天雷王子，显圣生化在云头……家住雷州雷王庙，年年行鱼教田畴。”

第五节 西汉南海丝绸之路航程与交易对象

一、汉使船队始发港

东汉史官班固撰《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中记载，汉武帝年间：

^①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我国正史记载有关中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上航线最珍贵的资料。据研究，都元国位于马来半岛；邑卢没国位于缅甸沿岸勃固附近；谿离国是伊洛瓦底江边的海港；夫甘都卢国在缅甸之蒲甘；黄支国即南印度古国拔罗婆朝的首都建志补罗，今Conjeveram；^①皮宗是马来半岛的Pisang；已程不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段记载起码表明了以下几点：①始航地是雷州半岛，乘的是中国船，至远海是由蛮夷商船转送。②航海者是黄门译长及招募的水手和其他人员，携带黄金丝绸，购回珍宝，这是官商。海南特产的“广幅布”也是一种超宽的缯布，可归入“杂缯”类，大陆的布幅一般宽度为二尺二寸（1寸=3.3333厘米），“广幅布”宽度达五尺，折合为1.15米（汉代一尺等于今天的0.23米）。③其路线是：广东徐闻→合浦→日南障塞→印度支那半岛→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④自汉武帝以来，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都遣使朝贡。

但是，由于古汉语文字没有标点，2000多年来，关于汉使的始发港始终是一个聚讼问题。现代刊行的标点本《汉书》中，这段话的首句标点为：“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也有的学者自行标点作：“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还有的标作：“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不同的诠释，主要论点有：一种认为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是四个地名，

^① 荷兰学者戴闻达在《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中认为，这个“黄支国”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同为始发港；另一种认为“塞”即“要塞”，“障塞”是指边塞或堡垒；还有一种解释是指从日南郡的边境或徐闻、合浦航海出发。这几种说法大多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如果“障塞”是地名（港口名），为什么日南、徐闻、合浦屡见于史册，而“障塞”再未出现过？一个重要的港口断无立即消失的理由；其次，如果“障塞”是指边塞、边境，便不是港口，亦没有与千里之外的徐闻、合浦两个始发港相提并论的理由，从地名顺序上也不应如此混乱；最后，如果是指从日南郡的边境或徐闻、合浦港出发，则日南边境与徐闻相隔千里，更无同样航行五个月到都元国的道理，两地至少相差一个月航程。

较为合理的一种可能性是，《汉书》中这句话应标点为：“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句中“障塞”乃名词，日南“障塞”确是指候官管辖下的“障”址（汉简上作“鄣”址）和“塞”址，可作边塞解，那么《汉书》中上述这句话就可理解为“自日南边境算起，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船队航行大约五个月，有都元国”。因为日南是中国当时的最南境，离开日南郡象林县界才算真正出国，以此计算海程也是最合理的。

此外，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句中“障塞”乃动词，从词义上分析，这个句子可释为：“自从日南（港）被阻塞以后……”即日南原为南越国的始发港，在汉武帝平南越后一度“障塞”，才启用徐闻作为第一始发港。“障塞”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自然的原因，即港口淤积，这个可能性很小；二是人为的原因，即由于日南、交趾、九真一带发生动乱或失控，这个可能性很大。《交州外域记》记载，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时，任越王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因此，交趾、九真一带实际上是“自治”性质。《汉书》中也有这么一段史实：湘成侯监居翁，原为南越桂林监，听到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所率汉军攻破番禺后，下令瓠骆民四十余万投降，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五月被封为侯，他的儿子益昌后来嗣侯位，职任九真太守，因“盗使人出买犀、奴隶”而坐罪。因为犀（角）由朝廷专营，地方官员或私人买卖是犯法的。由此观之，居翁可能是二使者之一，被伏波将军路博德任为九真太守，后其子承父侯位及官职。另一个使者可能是都稽。日南是否亦由雒王或雒将所主，史无记载。但交趾、

九真郡是通向日南郡的陆上必经之路，日南是很难成为汉人主政的“飞地”的。在这种情况下，日南自然不适宜作为积存贵重“黄金、杂缯”的始发港，必须另觅新港址。

海南珠崖、儋耳二郡又如何呢？“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年间，凡六反。”自然亦不适宜作为始发港。而合浦郡是真正由汉都尉治理的郡，汉使积财物于此十分安全。合浦郡政局稳定，其郡治徐闻此时已成了西汉版图上大陆南端的一个重要港口。一来占了天时地利，二来为保障航运安全，始发港改设在徐闻是十分合理的。此外，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重要原因：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南下平叛，在番禺会战，纵火烧城。番禺城在大火之下毁于一旦，一度失去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很久尚未恢复元气。交趾刺史治初治龙编羸娄。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曰交州，刺史治移广信（今封开县）。^①也有一说认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治移广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交趾刺史治龙编和广信（今封开县）。而此时徐闻作为合浦郡首县，即郡治，行政级别已上升至与南海郡治番禺同等。秦汉时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合浦郡由都尉治，应属小郡；番禺是南海郡治，《史记》引张晏语：“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屠睢为南海尉，说明南海也是都尉治，自然也属小郡。《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桓合浦属交州。户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崖（珠崖）。”已知当过徐闻令的东汉初就有2人，其一是合浦黄泥岗清理的一号墓出土“徐闻令印”，墓主人名叫陈褒是东汉初年的徐闻令。《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承秦制，设徐闻县长官为“令”，表明它是万户以上的大县。郡治徐闻县占了合浦郡户数三分之二以上，又是首县。东汉建武二十年（44年）移治合浦县，合浦户数大增，方置“令”，这时连临允也置“令”了。据史书记载，直到西

^① 《宋书卷二十八·志第二十八》。

汉元始二年（2年），南海郡辖有6县，总户为19613户，人口为94253人，此时南海郡人口总数在交趾部七郡中排名第四，少于交趾、九真等郡。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徐闻港才有机会兴起，一举成为古代中西方海上交通史上一个最著名的港口。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认为：当时的首都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汉武帝大军也由此出发征伐岭南，经广西桂林灵渠下桂江至广信，或者经湖南永州潇水下贺江至广信，即延伸陆上丝绸之路到广信，从而与徐闻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所以，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一个最早交接点或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具有海洋性成分的理由和历史的重要标志。封开是海陆丝绸之路最早的对接点，也就意味着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海外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和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最早在此对撞交触，从而产生集这些文化大成的岭南文化。此说甚是。当时徐闻与交趾刺史治广信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汉朝廷才会在徐闻“置左右候官”。东汉史官班固为何对这段海上丝路的航程如此清楚？极有可能与徐闻二桥村出土的“臣固私印”有关。汉代龟纽鎏金铜印“臣固私印”经我国著名考古专家杜道松先生鉴定，认为是汉印，时代属西汉，定为二级文物。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认为这是一枚汉代急就章。笔者认为，其更有可能是东汉初期的文物。《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记载东汉初有“弟子固，固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善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56年）袭父友封显亲侯……”“章和二年（88年）卒谥为文侯”，还提及他“与马援交结”。窦固，东汉名将。字孟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固年少时因娶光武帝女涅阳公主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明帝想恢复与西域各族的联系，出兵西击北匈奴。窦固因明习边事，于72年12月，被拜为奉车都尉，驻扎在凉州酒泉郡，积极部署对北匈奴的进攻。73年，汉军分四路出击。窦固、耿忠率军由酒泉出塞至天山，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并以班超为假司马出使西域，招降西域诸国。其余三路汉军无功而返。75年11月，窦固率1.4万骑兵再出玉门关进军西域，在蒲类海击败白山部后，转军进击依附北匈奴之车师。车师王降。东汉置西域都护及军队屯田，逐渐恢复

了对西域的控制。窦固被拜为奉车都尉前仅任过黄门侍郎，随后迁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军都是在京城帝侧，其“明习边事”的经历从何而来？可能任黄门侍郎期间或到过徐闻督办译使出国及左右候官的“交易”事宜，黄门侍郎秩六百石，正符合汉代使用龟纽鎏金铜印的制度。因此黄门侍郎窦固很可能是“臣固私印”的主人。古时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汉时有以急就章私印处理一般公务的习惯，窦固或因离任时匆匆上路不慎将私印丢失在驻地徐闻，又因丢失的并非正式官印不至于被朝廷治罪。班超既为窦固的老部下，其兄班固从窦固的经历中了解到徐闻汉港之详情就顺理成章了。推测之词未足为凭，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汉使船队到达的国家和港口

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路线，有去程和回程二道：去程从徐闻、合浦出发，先后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已程不国为西行终点，这是东道，也是去道。从日南计程，到已程不国，共需时12~13个月。回程从已程不国返回中国，途经皮宗国而抵日南，需时约10个月。汉使去程第一站为都元国，都元国所在地至今没有定论，主要有越南南部说、马来半岛中部说、马来半岛南端说、苏门答腊说。

汉使回程时一个重要的中转港为皮宗。关于皮宗的所在地学者们有很大的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是日本藤田丰八郎和我国的韩振华先生定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香蕉岛；二是许云樵先生主张在马来半岛西南部的柔佛一带；三是朱杰勤、周连宽先生的越南南部说，一主平山，一主南端小岛Panjang；四是丁正华先生定在狼牙修。作者认为定在曼谷附近的巴塞河出海口一带较为合理。如果在越南南部，到象林1个月就足够了；在香蕉岛则2个月航行时间不够；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中部东北岸的北大年一带，没有风帆，汉使船队2个月航行时间也到不了象林界。泰国湾6月至9月洋流为顺时针，流速为1节左右，从曼谷出发至越南南部的金瓯角沿岸航程约500海里，

航行时间约21天；金瓯角至象林界（岷港附近）约600海里，4月至9月受西南风影响洋流为东北流，流速约0.5节，但在8月平均可达1.1节，以流速0.7节计，越南南部沿海航行时间约36天，加上泰国湾北岸航行时间21天，约2个月，与《汉书》“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的记载吻合。

三、南海丝绸之路的交易对象

根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中记载，汉使带去的是“黄金、杂缯”，换回的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所谓“异物”，从其他记述中推测还包括犀牛、象牙等物。

相传用犀角杯饮酒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汉代以之作饮酒器具。汉代还以犀皮作腰带等装饰物：“犀牛皮坚而有文，其脐四旁文如饕餮相对，中一圆孔，坐卧磨砺，色甚光明，西域人割取以为腰带之饰。曹操以犀毗一事与人是也。”^①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朝贡贸易出现第一个高峰。

四、“为汉使转送致之”的蛮夷贾船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以为“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蛮夷贾船就是指外国的商船。对此作者不能苟同。“蛮夷”并非特指外国。南越国赵佗在致汉孝文帝的书信中自称“蛮夷大长”，其引用高后对南越实行封锁的旨令时谓“毋予蛮夷外粤金铁器”。并说“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可见西汉时岭南各地均称“蛮夷”。汉使船队从徐闻启航，开始的是第一次官方性质的出访，没有南越富有经验的商船引路，是难以成行的。同汉使入海的“应募者”中必然包括这些南越蛮夷贾船及船工。由于航路遥远，所经国家众多，语言复杂，汉译使不可能都能听懂，须要重译甚至几重译方能沟通，因此中间有一些别

^① [明]都穆《听雨纪谈》。

的国家商船辗转相送，作为向导，也是必要的。

五、汉使船队始发的时间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中记载，汉使船队与海外交通在汉武帝年间，但具体年份未详。据东汉人郭宪撰写的《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牛。”此时离路伏波将军平定南越仅3年多，假定汉使初出使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航程一趟需“数年来还”，此大秦国贡使当为与汉使返回中国时一起来的大秦国（或者是冒充的）第一人。汉使船队始发的时间应在元鼎六年或元封元年。

第六节 西汉海上丝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由于汉徐闻港特定的自然地理和军事经济地位，如果没有徐闻港，西汉时期就不可能有官方经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推迟到东汉风帆出现之后才会发生。汉徐闻港无论在航海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在军事地理上，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和作用。

从史学上讲，汉徐闻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官方史书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以汉徐闻港为始发港的海上丝路航线，是中西海上交通史上记载最早、最详细、最完整，也是最长的由汉官方经营的海上丝路航线，它首次记载汉船队所携带的主要交易物为丝织品（杂缯），正式翻开了中西方国与国之间海上交流史的第一页。

从政治军事上看，汉徐闻港作为南方沿海的军事重镇，对维护国家统一，保证海路畅通，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由于是汉官方使节带队，中国的

外交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范围更广。

从文化上看，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扩大了辉煌灿烂汉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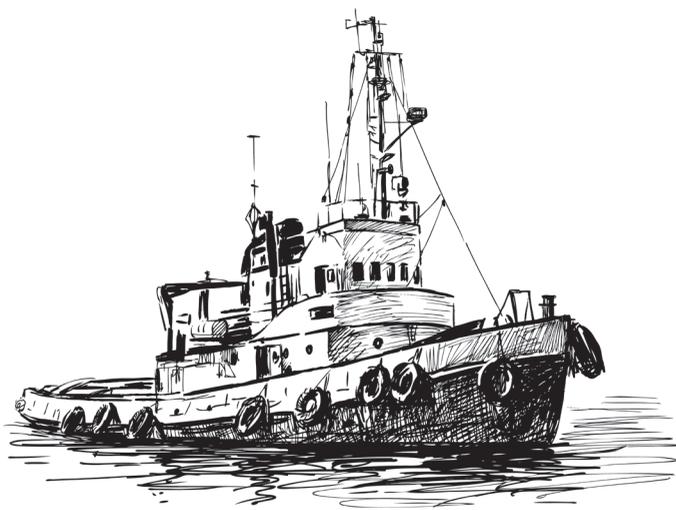
从自然地理上看，汉徐闻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海上丝路航线上最适合的候风港。

从经济上看，作为汉代岭南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西汉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门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①。

“欲拔贫，诣徐闻！”西汉徐闻港为汉帝国的繁荣兴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 第二章 ·



东汉三国时期

第一节 风帆的出现与南海新航路的开通

中国船舶风帆的出现年代，迄今虽尚无定论，但不少学者认为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风帆，认为甲骨文中的“凡”字即为“帆”。风帆真正见于文字，最早出现在马融于东汉元初二年（115年）献给汉安帝的《广成颂》一文中。《广成颂》中关于风帆的描述：“然后方馥皇，连舳舟，张云帆，施霓帟。”由于风帆在航海上的应用，使海上交通出现飞跃性的变化，船舶航行速度提高了数倍，远洋船可横跨大洋，不必沿岸行驶。有经验的船工从广州出发，可经由海南岛东部的七洲洋快速直插越南中南部的林邑。孙绰的《望海赋》，也说当时“商客齐畅，潮流往还，各资顺势，双帆同悬”，反映出当时海外交通兴盛的概况。新航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航程和航行时间，降低了海运成本，促进了南海丝绸之路的繁荣。东汉广州城砖上的楼船图，不但有重檐亭阁，而且有帽形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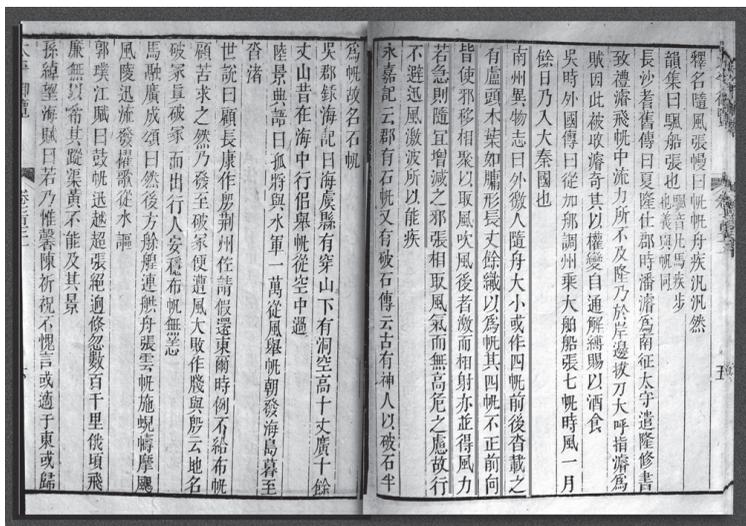


图2-1 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三国东吴万震所撰的《南州异物志》上关于东吴南海帆船多桅帆装及其驶风技术的记载



图2-2 东汉楼船复原模型图

《吕氏春秋》卷九“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这是古人关于地磁现象最早、最精准的记载。古人将天然磁石制成勺状，放于铜盘上以示方位，其柄所指为南方，这就是司南。作为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徐闻出土了东汉龙首勺司南，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这个龙首勺司南当时是从船上带过来的，还是从陆上带过来的？

第二节 大秦道的开通

三国时航行于南海的船舶，“大者长二十余丈（1丈=3.3333米），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①。主要有中国、波斯、天竺等国的海舶，大船长达50米，载重可达千吨！

公元97年、120年、131年掸国（今缅甸）多次遣使来华贡献，永宁元年（120年）贡品中有“国之珍宝、乐及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南通大秦”。这是三国时第一次在中国文献中提及海道通大秦。罗马商人在公元1世纪时已发现通往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用拉丁文撰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其记载：中国船在印度的港口装船，货物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颜料和医药产品。中国丝绸不仅受罗马贵族的欢迎，而且一般市民也普遍使用着。由于罗马帝国需要大量进口丝绸，对安息（波斯）商人垄断丝绸贸易大为不满，打算另辟道路直接从中国进口丝绸。罗马人对中国南方产的珍珠、珊瑚、琥珀、象牙、犀角、玳瑁、药品、香料等也很感兴趣，但这些产品的贸易却被安息（波斯）商人垄断。《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三国时，吴国版图达今越南中南部，大秦国（古罗马）人经商，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公元83年之前，岭南的交趾、九真、日南、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汎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②公元83年以后在湖南南部增开陆道，东汉建武二十年（44年），合浦郡治由徐闻迁往合浦县。另外，唐代莫

① 《御览》引《南州异物志》。

② 《后汉书·郑弘传》。

休符在《桂林风土记·灵渠》中也提到：“后汉郑弘奏交趾七郡贡献从东泛海，多没溺，请开桂岭灵渠。”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废儋耳郡，为珠崖郡辖。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罢珠崖郡，改为朱卢县。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朱卢县置珠崖县，属合浦郡。^①

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桂阳峽道开通，也部分取代了徐闻港的作用。但是，桂阳峽道开通以后，海上交通依然存在。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域传》及《东观汉记》记载的番舶来朝有以下数次：①“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2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②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②。《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③“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叶调国^③也遣使渡海来洛赠礼。④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王便遣使贡献”“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④“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调亦赐金印紫绶。”^⑤⑤“天竺国一名身毒……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

① 张荣芳、周永卫在《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提及：关于朱卢的地望，徐松石先生最早提出朱卢在海南岛北端，见《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944页附图。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言其不详，待考。1983年在海南岛乐东县出土了一枚西汉银印，印面篆体“朱卢执封”四字。陈高卫（《西汉“朱卢执圭”银印小考》，《人民日报》1985年6月10日）、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克荣（《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第246页）、杨式挺（《“朱卢执封”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等据此印均认为朱卢在海南岛。谭其骧先生（《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则认为朱卢在今广西博白至玉林一带。黄展岳（《“朱卢执封”印和“劳邑执圭”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叶调”对应古爪哇语之Yawadwipa。

④ 《后汉书·顺帝纪》。

⑤ 《东观汉记》。

献。”^⑥前述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罗马皇帝马克·奥理略遣使贡献。以上掸国即缅甸，叶调即爪哇，身毒即印度，黄支即印度南部的建志补罗。掸国或许从陆上来，其他三国及罗马则肯定是从海上来的。^①

随着粤西地区的逐步开发，粤西地区土著人物也逐渐为汉朝廷所赏识。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高兴郡（今化州市）人李进平“荆蛮”有功，升武陵太守。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李进晋升为交趾刺史，成为粤西地区土著第一任交趾刺史。

徐闻的长官，也一度可能由粤西地区土著出任，合浦黄泥岗1号墓为此提供了证据。据考古报告，黄泥岗1号墓于1990年发掘。该墓属东汉早期墓，是一座有斜坡墓道的砖木合构墓。墓室长方形，分前、后两室。由于墓未被盗，随葬品保存完整，共计96件。出土铜器有剑、壶、釜、碗、蒸酒器、灯、镜、捣药臼和杵，铜明器仓、灶、井等；陶器有壶、罐、和明器屋；玉器有圆形蒲谷纹璧、出廓带字玉璧、字母形带钩、玉塞、蝉形珞、玻璃纹玉佩和玉剑饰；还有玻璃杯（碗）、玻璃串珠、玛瑙、琥珀串珠、金带钩、金花球串饰和“货泉”钱币，十分珍贵，有些是以往罕见或未见的。如金花球串饰，似是用金丝制成球状，表面再焊接上一颗颗小珠。据说这种制作工艺，出自古希腊或古印度。据杨式挺先生考证，广州南越王墓也出有32颗金花泡，圆形一面鼓起，正面有各种精细花纹图案，背面有一根横饰，是墓主所穿的“珠襦”上的纹带饰物。据说最早见于两河流域。总之，金花球和金花泡都是“舶来品”。那件出廓带字玉璧，也为国内汉墓所罕见。其顶部出廓的部分，透雕龙凤对舞装饰图案，中下部镂空刻出“宜子孙日益昌”，篆体6字吉祥语，连外廓通高27厘米。悬山顶铜仓一件，瓦面、门面、墙壁均篆刻精细美观花纹，底部附4根柱子支撑。尤为重要的是该墓出土两颗印章，一颗是滑石质、瓦钮、印面阴文反书“徐闻令印”四字，刻工较草率，应为冥印；另一颗铜质、龟钮、印文“陈褒”两字，为墓主私印，也应为冥印。

^① 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据考，“徐闻令印”的“令”当是县令，是一县最高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徐闻县长官是“令”，表明它是万户以上的大县。从同出的“陈褒”私印，说明墓主陈褒可能是合浦人，生前被派出任徐闻县令、死后归葬祖籍。汉代实行厚葬制度。黄泥岗1号墓随葬品丰富多彩而且相当奢华，“说明他生前管辖的地方相当富庶，应同繁荣的海外交通贸易也有密切关系”。随葬舶来品应为陈褒任徐闻令所得。

《后汉书·西域传》又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一作马墩，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正史中关于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正式记录，虽然罗马文化当时已非常昌明发达，与汉文明交相辉映，但这次“其所表贡，并无珍异”，使汉人“疑传者过焉”。据研究，这次航行是公元163年罗马（大秦）皇帝安敦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使者所献的象牙、犀角、玳瑁似为安南所产，并非从罗马带来的，应是在安南登陆，就地采购的土产。自此至隋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交往。

灵帝熹平三年（174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周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①

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②；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③。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仍然相当发达，尤以交趾至福建一带为最。

此时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首要的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陆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④

① 《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②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③ 《后汉书·桓晔传》。

④ 《三国志·魏志 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即指陆路丝绸之路；“又循海而南”，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红河水道到云南再由陆路转金沙江通四川。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今印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①。其流路线，有可能经过今云南地区的陆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②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它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③然则，从巴蜀出发，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陆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繒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④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陆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建安八年（203年）士燮迁交趾太守。不久交州刺史朱符被土著所杀，区内大乱，士燮乘机上表推举其弟士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士（黠）领

① 《汉书·西南夷传》。

②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

③ 《汉书·西南夷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

九真太守，弟士武领南海太守。“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辘，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威震百蛮，尉佗不足逾也。”^①说明当时的合浦郡与交趾、九真郡一样常有胡人长住，这些胡人多与海上丝路有关。从《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的“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来看，佛教此时已传入岭南。

士燮是苍梧郡广信县人。其先祖是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县）人，在王莽乱世之时避难由山东汶阳迁徙到交州广信。其父士赐于桓帝时任日南（今越南中部顺化一带）太守。士燮少年时游学京都洛阳，研习《春秋》经传，后著有《春秋经注》《公羊注》《谷梁注》。东汉熹平四年举孝廉，后举茂才，补尚书郎，授官巫山县令，任交趾郡太守、安远将军、卫将军、龙度亭侯、龙编侯，政绩卓著，名满一方。其家族久居交州，又接纳了不少中原避难人士，势力越来越大：士壹任合浦太守，士黈任九真太守，士武任南海太守。一时间岭南成为士家天下。在当时诸侯纷争、中原动乱的情况下，岭南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故士家深得人民的拥戴。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

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骖为交州刺史。骖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骖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他的弟弟士壹、儿子士徽、族子士匡也都封了侯位。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角、

^① 《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象牙之珍，奇物异果，蕉、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士燮在郡任职40多年，黄武五年（226年）病逝，终年90岁，死后埋葬在越南。而其家乡苍梧县京南镇旧街、桂江边还有为纪念士燮而建的石墓、大人庙。

精美的雷州葛布与南珠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中国虽有不少地方出产葛布，但都不及“雷葛”。雷州所产的“雷葛”称为“正葛”，原料产于高凉硃洲（今湛江市硃洲岛）等地，雷州人用来制成精美的葛布。早在东汉三国时期，粤西的葛布就已成为贡品。吴国交趾太守士燮统治交州数十年，其弟士（黠）曾任徐闻令，士燮“每遣使诣（孙）权”，致细葛“辄以千数”，其中当不乏雷州半岛的葛布。

远在大禹时代，南海“玃珠大贝”就作为贡品。据《淮南子》和《雷州府志》记载：秦汉以来，历代封建帝王都把雷州视为珍珠的主要产地，下诏采珠。合浦郡产珠的记载很早：西汉成帝时（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有名之王章，贫寒时曾与妻子午夜牛衣对泣，后来做了京兆尹，因刚直敢言，以事忤当权之王凤，被王凤动以大逆罪下狱，其妻子八人俱连坐。嗣王章在狱内死，家属充戍合浦，家产俱籍没充公，因合浦产珠，王章妻子等到合浦后采获了大量珍珠，积蓄财产数百万。后来王章家属遇赦返回故乡，却得以珍珠资财，赎回田宅，安享生活。东汉时，合浦郡的采珠业一度十分发达。^①当时北部湾不仅合浦郡沿海产珠，海南也产珠。《汉书·地理志》序说：“自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为珠崖、儋耳郡。”《汉书》应劭注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产珍珠，故曰珠崖。”或又曰：“以郡形在海中如珠，故云。”得“大洲”的最初目的是因为珍珠和玃瑁。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珠崖郡为朱卢县，隶合浦郡。《后汉书·孟尝传》载云：“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徙于交趾郡界。”孟

^① 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尝，生卒年不详，字伯周，上虞通明人。东汉中叶名宦。早年出任郡中户曹吏，因其才能品德出众，任上为官清廉，尤其是采珠业复兴后，一方百姓得到安居乐业。所以在其因病告退时，合浦民众攀车相留，以致无法脱身，后只得悄悄乘船回上虞老家。

为纪念这位贤太守，“合浦”曾改名为“廉州”，寓“孟尝廉洁”之意。孟尝上虞家乡通明曾改为“孟尝乡”，孟尝出生地为“还珠村”，湛江的一条大江命名为濂江，唐玄宗天宝元年，以濂江河将石城易名为濂江县，湛江通明港的得名可能也与此有关。

从《后汉书》这段史料来看，在孟尝任合浦太守前，合浦采珠业已相当发达了，由于官吏贪得无厌、采捕无度，破坏了珍珠自然资源，致使珠苗到了灭绝的境地，也即是传说的“珠遂徙于交趾郡界”。孟尝到任后，看到合浦珍珠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珠民纷纷逃离家园。孟尝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合浦珍珠资源得到了保护和繁衍，于是有“珠还合浦”之说。上述资料说明早在汉代以前合浦采珠业，已是相当兴盛了。东汉时合浦珍珠业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可是由于频年滥采，珍珠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故《后汉书·孟尝传》有“珠徙交趾”之说。孟尝任合浦太守前曾拜徐令，汉徐县时属临淮郡，在今安徽泗县西北部，但如果是在徐县令任上由“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也未免太过巧合了，也有可能是直接从徐闻县令任上直接升迁的，有待考证。

吴交州刺史陶璜以合浦百姓采珠为业，用珠贷米，而三国孙吴时，珠禁甚严。吴归晋后，陶璜乃请准，每年自10月迄翌年2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族自由来往，民困一苏。

第三节 交州刺史部的改置

建安八年（203年），张津为交趾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他们共同上

表将交趾刺史部改作交州刺史部，汉献帝同意其所请，把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郡、县三级。交趾部改称交州，州治仍设在广信县。张津为交州牧，士燮为太守，辖岭南九郡。汉武帝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将岭南分为九郡（后改为七郡），又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嬴娄（今属越南），不久便迁至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后汉书·郡国志》交州下刘昭注引王范《交广春秋》所载略同于《尚书大传》：“交州，治嬴娄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按东汉建安八年（203年）始改交趾刺史部为交州，因此，王范《交广春秋》所说的“交州”，实即两汉的交趾刺史部和东汉末的交州。广信是新设的苍梧郡郡治，处于漓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宁，向北则可通过漓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较为便利。“广信”之名，取自汉武帝时“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今封开和梧州），广信又是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汉武帝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杂缯等购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经南流江—北流江和鉴江—南江两条贸易通道输入广信，再经贺江—潇水输往中原。广信还是岭南早期的文化中心。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除了原有的监察权外，还拥有管理各郡的军政大权。东汉时期，这里成为文人学者聚集之地，他们在此开展文化活动，设馆客授生徒。其中文名最盛的是经学家陈元和士燮。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晚年回广信办学，成为岭南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士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还一度“董督七郡”，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来依附，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以讲学为业。广信具有山、江、海交叉一体的自然环境，同时具有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人文历史与环境。

第四节 交州刺史部的迁徙与广州的再度兴盛

公元208年，赤壁一战，刘备联合孙权打败了曹操，结束了汉末天下纷争、军阀混战的局面，开始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新时期。在三国中，孙权力量最薄弱，只能借助长江天险，偏安一隅。为了巩固实力，必须不断开发江南和岭南。

“建安中，吴遣步骖为交州（刺史）。步骖到南海，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重修在南越国被攻陷时遭到破坏的番禺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①一说步骖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至番禺。从此，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三百年历史宣告结束。东吴永安七年（264年），又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广信转移到番禺。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记载，后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东吴“（吕）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吕岱代步骖为交州刺史。交州仍治龙编（今越南河内），广州移治番禺。《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又载，孙休（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又分交州置广州。当时岭南一带“土广人众，险阻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

^① 《水经注》。编者按：《水经注》“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吴国交州刺史步骖将州治由广信迁至番禺。”误，第42页同误。建安二十二年乃建安十五年之误。见王范《交广春秋》。步骖于建安十五年进驻番禺，倘州治于建安二十二年始迁番禺，则建安十五年至建安二十二年，则交州州治出现空白，《广东通志》之误源于《水经注》。《水经注》盖以建安二十二年孙权降曹，向汉廷申报属地情况时间误为交州州治由广信迁至番禺的年份。《广东通史》第308页：步骖“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把交州治所从广信迁至番禺”同误。

治”。^①他初到任，便平定了交州西部桂阳、郁州的民众叛乱，生缚首乱为害的王金，传送到京斩首，俘获万余人。因南征有功，孙权封他为安南将军，持节，掌征伐，赐都乡侯。

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卫将龙编侯交趾刺史士燮卒，孙权以士燮之子士徽为九真太守，封安远将军，以陈时代士燮为交趾太守。吕岱以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太远，上表分交趾以南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北）；以合浦以北南海、苍梧、郁林、高凉等郡置广州，自为刺史，治番禺。以广州为中心，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吕岱命陈时、戴良率兵由陆路南下，士徽拒不受命，自署交趾太守，以兵布海口，抵挡陈时、戴良大军。吕岱亲督三千亲兵，由合浦郡晨夜浮海，突然间出现在士徽军前，士徽不知所措，“果大震怖，斩获万数”。士徽也“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随后，吕岱“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大小承风”，又两州合一，恢复旧制，仍为交州。使“南土清定，三郡晏然”，有力地控制了岭南诸郡，并将东吴的政治势力远伸到扶南（今越南南部）、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和堂明（今南洋群岛一带），使东吴“永无南顾之忧”。^②是年，大秦贾人秦论由海路来到交趾，交趾太守陈时派人护送他去觐见孙权。^③黄武五年（226年）至黄龙三年（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按孙权的指示，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奉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他们回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据《梁书·诸夷列传》，三国时代从扶南到印度的路线是：“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克拉地峡），循海大湾（暹罗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则到天竺江口，逆水七千里乃至焉。”吴之海上发展，盖迈轶东汉矣。

东吴黄武七年（228年），合浦郡改为珠官郡。郡治在徐闻，领朱官

①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② 《梁书》卷五十四：“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黠歛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入。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乃径还本国也。”案：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在嘉禾三年至六年间（234—237年），梁书所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

③ 《广东通志》：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郡治设在徐闻，以遥领海南二郡，招抚当地人民。

(珠官)、朱卢二县。^①“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②孙权曾对珠崖和夷洲用兵,珠崖与夷洲相隔不远,夷洲应在珠崖(海南岛)附近,学者多认为所指为台湾。亶洲传说为今之日本群岛。《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逊疏有云:“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三国孙吴初年,久居岭南的薛综上疏论述汉代以来的岭南情况,“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然在九旬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徙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按珠官即合浦郡改名),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之藪……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薛综的话概括地指明了岭南地区民族杂居和经济、文化的落后情况。

东汉末年,埃及的“胡床”(折叠椅子)传入中国。当时的汉灵帝酷好胡俗,大殿里就摆放着“胡床”,引起了王公贵



图2-4 胡床

① 《吴志·孙权传》。

② 《吴书》卷三《孙休传》。

族的争相模仿，因而“胡床”在京都洛阳红极一时。《三国志·武帝纪》甚至记载说，曹操在行军打仗时，仍不忘带上“胡床”。“胡床”在雷州半岛流行至今，因为雷州半岛天气热，特别适合夏天乘凉，当地人亦称之“凉床”“马扎”。

《开宝本草》说植物益智“《山海经》云生昆仑国”，查《山海经》无此文，恐为误引。但从文献来看，魏晋时两广已有此物。

东汉末年，印度佛教开始从海外经合浦传入苍梧并得以向西江流域及内地发展。牟子，从中原迁交州后任交趾（苍梧）太守，汉末佛学家，潜心钻研《老子》和佛学，是岭南最早研究佛学的人。牟子针对一些人开始对佛学存在的疑虑，用问答的形式著有《理惑论》，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专著之一，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牟子所著之书中有许多关于佛教僧侣的记载：“今沙门剃头发，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等。可见，至少在东汉时，交州佛教已颇为兴盛。牟子在把佛教思想本土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徐闻是海港，胡商不少，其中有佛教徒和胡僧，因此他们以佛教礼仪来迎送“雄长一州”守令也在情理之中，东汉末年交州佛教比其他地区兴盛则是事实。东汉前佛教庙宇尚未流行，偶像通常为狮子、莲花之属。狮子不是中国所有的物种，狮子形象始于汉朝，据说狮子是从西域传来的。相传东汉汉章帝时，西域大月氏国把一头金毛狮子作为礼物进贡给中国的皇帝。狮子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成为一种赋予了神力的灵兽。唐代高僧慧琳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雷州半岛现存“石狗”，实际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石狗，约出现于唐代；另一类则是石狮，而石狮的出现比真正的石狗出现得更早。现存“石狗”中有的形态古朴，无底座或底座很薄，实际上就是东汉狮子的汉式“形象派”作品，是早期佛教传入雷州半岛时的遗物。

东晋高僧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以六十岁高龄，结伴十人同行，徒步经西域和中亚十国抵达天竺（印度）求法，抵达时仅剩两人。至

义熙八年（412年）才由东印度乘船至狮子国（斯里兰卡）返国，前后共历15年，携回了《摩诃僧祇众律》《十诵律》《杂阿毗昙心》《大般泥洹经》《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土所无的大小乘的基本要籍。法显和佛驮跋陀罗共译出《摩诃僧祇众律》《僧祇比丘戒本》《大般泥洹经》等。此外法显还将他西行求法的经历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保存许多宝贵的西域古代史地资料。

第五节 珠崖郡治移置徐闻

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用贾捐之议，罢珠崖郡。至建武十九年（43年），始复立珠崖县，盖沦于异域者百数十年。

《元和志》记载：赤乌二年（239年）于徐闻县侨置朱崖（珠崖）县。即仍以徐闻遥领朱崖（珠崖）县。

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孙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3万，讨珠崖、儋耳”。^①吴志陆凯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②是年，分珠官郡的徐闻县与原儋耳、珠崖二郡诸县另立珠崖郡，郡治徐闻。^③

“珠崖在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领之。”^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徐闻都作为海南的政治中心。

吴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甚密。《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记载：“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

① 《三国志·吴书》。

② 《三国志·吴书》。

③ 《汉志》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汉称交趾刺史，后变称交州，而酈沿之，酈言汉郡治合浦县，阎若璩从之。

④ 《初学记》卷八引《交广二州记》。

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赤乌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

孙亮执政后（252年），改珠官复置珠崖郡，郡治仍在徐闻。

东吴于永安七年（264年）将岭南分为广、交二州。广州辖郁林、苍梧、高凉、南海4郡及合浦北部都尉，治番禺；交州领合浦、珠崖、交趾、九真、日南5郡，治龙编（今越南河内）。其后数年，合浦郡战事不断，平乱大军多取道雷州半岛沿海或直接从雷州半岛出发。

宝鼎三年（268年）“遣高州刺史刘俊，前部督脩则等人击交趾，为晋将毛昊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①。

建衡元年（269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综、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建衡三年（271年）“是岁，汜、璜破交趾，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大政，分交趾为新昌郡”。

徐闻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始终起着通往海南岛的门户作用。史书多处记载徐闻作为郡治，在东汉几个历史时段“遥领”海南，不仅延续了海南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也维系了中原对海南的统治关系。

^① 《三国志·吴书》。



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书系
港口篇

湛江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 编

陈立新 张波扬 陈昶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倩

责任技编：许伟斌

装帧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墨 QQ:344581934

ISBN 978-7-5454-6588-4



9 787545 465884 >

定价：60.00元